

革命年代丛书

# 革命闯开 跃进路

北京出版社



www.duxiu.com

北京四史丛书(7) 革命開开跃进路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甲51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4 6/16·插页: 2·字数: 82,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

統一书号: 10071·762

定价: 0.28元

##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出一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未屈服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经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创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继续艰苦奋斗，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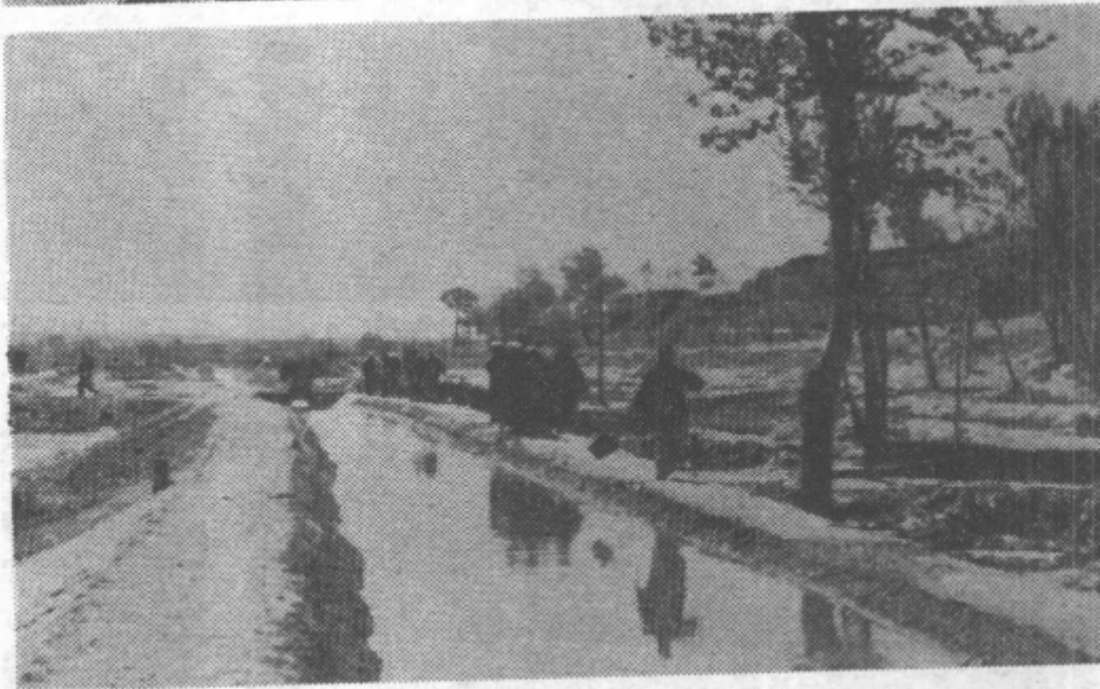
基于这种认识，我們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中选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丛书》，陸續出版，作为北京市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加上这项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课题，这套丛书的缺点与錯誤一定难免。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

編 者

上：一九五五年冬，团河村男女社员齐动员，挖河打井，战胜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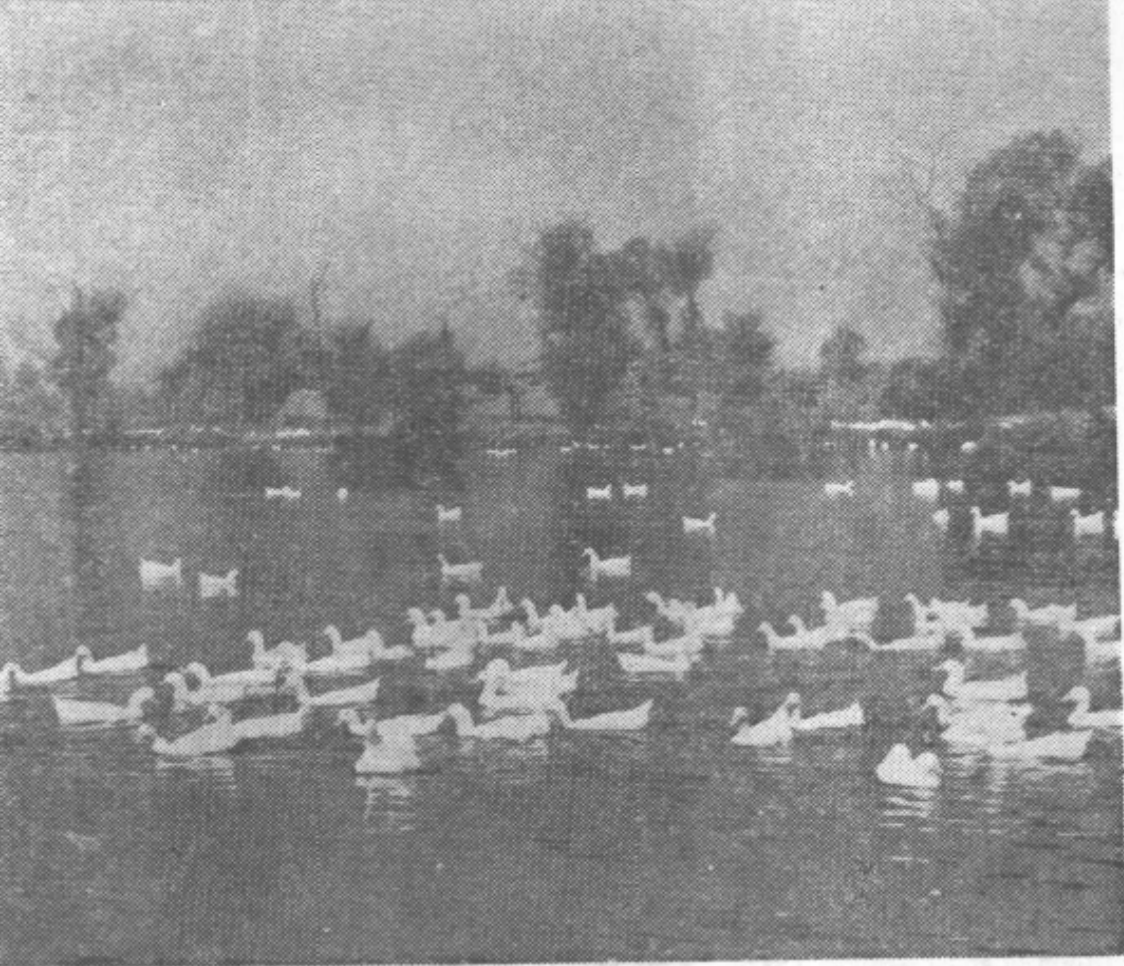
中：社员们顺着新修的大渠下地干活。



下：这是金星大队新盖房屋的一部分。







上、下：

人民公社化以后，金星大队的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这是一九五九年，社员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兴办的鸭场和牛场。

## 目 录

革命鬧开跃进路·····	( 1 )
——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金星大队簡史	
一、血泪篇·····	( 3 )
二、翻身篇·····	(22)
三、合作篇·····	(34)
四、跃进篇·····	(81)
要把革命鬧到底·····	(99)
——記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志远庄生产队党支部書記 苏树业的家史	

# 革命闖开跃进路

——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金星大队簡史

过去的盐碱滩，           今天的米粮川！  
过去的“苦海子”，       今天的幸福园！

来到金星大队，呈现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景象。田野里，土地成方連片，平整如鏡，一道道銀帶似的水渠，纵横交錯，一条条高低压輸电綫路，連接着几十个揚水站、电井房、粮食加工厂……。这里不仅农业生产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而且初步做到了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漁互相促进，綜合发展。目前全大队每隔两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設備比較完善、管理比較科学的畜牧場，飼养着上百头奶牛，上千头猪，上万只填鴨。春季，田里一畦畦稻秧，葱綠茂密；夏季，麦海騰浪，綠树成蔭。水塘里，芦壮魚肥，鵝鴨成群。人們看了这一些，会情不自禁地称赞这里已經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北国江南。

金星大队，座落在北京永定門外离城三十里的地方，現在是大兴县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拥有一千



零八十三戶，五千三百多人口，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九亩上地。人民公社化以后，經過几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北京市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仅一九六四年就向国家提供了猪肉二十三万斤、牛奶二百六十三万斤、水果二万一千多斤、鮮魚四千斤、北京鴨五万三千只。这里，粮食产量已在一九六二年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規定的指标。

但是有誰能够相信，就是这个地方，解放前竟是远近馳名的“苦海子”？那时这一带地方，盐碱低洼，十年九涝，連“蛤蟆撒尿都要涝”，好年景每亩地才能收入百十斤粮食，一遇灾年，常常顆粒无收。正象一首民謠說的那样：“一場雨二斗三斗(每斗十五斤)，两场雨一斗二斗，三場雨一斗不斗！”

解放前这里不仅天灾不断，而且人祸严重。皇帝游猎，太监圈地，軍閥爭田，匪霸橫行，再加上美日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烧杀搶掠，弄得人們啼飢号寒，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金星大队的社員們对今天无限热爱，对未来满怀信心，对集体充滿自豪感，他們說：

天上有顆启明星，    地上有顆亮金星，  
天上启明有时灭，    地上金星放光明。

忆苦思甜倍觉甜，追昔撫今更爱今。金星大队的农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尽管目前史料搜集不全，沒有現成的文字資料可用，写不出一部完善的队史，但是仍然想方

設法，克服了种种困难，編写出这部大队簡史来，一方面，可以为将来編写大队詳史做一点基础工作，提供一些方便；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后代的人們永远不忘階級苦，奋发图强，在老一輩人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繼續高举革命紅旗，用自己勤勞的双手，在这块大地上，續写出金星队史中更新更美的篇章。

## 一、血 泪 篇

修行宮 黎民膏血尽

建庄园 穷人苦难深

“天变地变主人变，穷人受苦沒有变”，这是金星大队广大贫农、下中农对自己往日悲惨命运的傾訴。金星大队下屬二十四个生产队，共有十八个自然村。解放前村村都有自己的变迁史，每篇变迁史又都充滿了穷苦人民的血和泪。

先从金星大队最大也是最老的庄子——团河說起。

团河村西有座团河宮，是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在南苑（俗称“海子里”）的行宮之一。团河宮的建筑非常豪华，一进大宮門里，是东西配殿，随后是九間正殿，殿的四周有迴廊相連。九間正殿西側，临湖有乾隆靜书室。进二宮門，內有三个庞大的人工湖，湖中有七十二泉，湖滨假山上，松柏蒼蔚，楊柳婷立，树丛間掩映着一座座亭台楼阁，很有些西湖景色的特点。

乾隆皇帝为了偶而来此一游，竟强迫劳动人民修建这

样一座占地周垣四里的大宫殿，开凿这样大的人工湖，修建这样的假山，移栽这样多的树木，这要耗费劳动人民多少血汗啊！乾隆皇帝为了平息民怨，行宫建成后，于一七八一年曾假惺惺地写过一篇所谓“知过论”，用以“自讼”。但是刚刚“自讼”过后，又慌忙撰文刻碑替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南苑团河本因疏导泉源，以通水利，遂于其傍构行馆数宇。”还特别声明说：“其费用内帑节省之项，而物给价工给值，非特无加赋税与徭役以病民，而供役者且资以养贍。”然而，人民群众对这段历史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人们传说乾隆这个自命风雅、三下江南的封建统治者，迷恋江南景色，不思回朝，于是他的臣子才想出在团河用人工造个北国“苏杭”，使他回“鑾”还“朝”。

宫殿建成后，朝廷调来重兵把守不说，还迁来十八户“院户人家”（咸丰年间增加到三十户，清朝末年已有八十多户），为他们打扫修治宫殿。

清王朝腐败无能，一九〇〇年八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侵入北京，给团河一带又招来一次兵灾洗劫。团河宫本身也遭到严重破坏。八月初，日本兵、英国兵、印度兵先后闯进团河宫，把前后大殿的珍宝抢劫一空，并且把不能带走的名瓷玉器砸得粉碎，轰走了养在“海子里”的一千多头牛和四不象。<sup>①</sup>

① 团河宫彻底毁于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后和国民党劫收时期。一九四二年日寇开始拆毁团河宫，拆去砖瓦木料修飞机包和廊房、黄村、南苑等地的火车站。国民党时期，蒋匪军队砍伐树木卖钱贪污，只四五年工夫，团河宫就被拆得一千二净。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清王朝訂立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使清朝國庫日益空虛，支付不了龐大官僚機構和奢侈生活的巨額費用，慈禧便下命在團河設立“官產局”，拍賣“龍票”，出售“海子裏”的荒地。

從此，一些皇宮太監、封建官僚、皇戚顯貴買了“龍票”以後，就紛紛圈地墾田，建立私人莊園。這裡有任老公（太監）的“志善堂”（現“振亞莊”），崔老公的“藕合堂”（現“志遠莊”），劉老公的“吉程莊”（現“小白樓”），馬老公的“濟德堂”（現屬團河北隊），鎮殿將軍吳能的“三畬莊”（現“老三畬”），朝廷命官安宗恒的“萬義莊”（現“建新莊”）等等。金星大隊所有的莊子（除新建莊是一九五六年建立的外）都是清廷權貴們圈地建立的。

這些封建顯貴廉價僱傭一些從山東、河北、安徽等地逃荒來的人當長工，為他們建莊、開荒整地，對長工進行殘酷的剝削。如任老公強迫長工每天干十四、十五小時的重活，並且“掛羊頭賣狗肉”把莊子定名為志善堂。但是“志善，志善——純粹裝蒜”，莊里雇有二十五六個長工，不僅經營土地，還開設了粉坊、油坊，把制作出來的香油、粉條，送往任老公在城里開的店鋪去，從事商業剝削。長工們累死累活地干，得到的照樣是貧窮、飢餓！

辛亥革命以後，隨着清朝統治的被推翻，一些太監和封建官僚也衰敗下來，有許多莊子更替了主人，落到了北洋軍閥的魔掌中。如任老公的志善堂賣給了段祺瑞。段祺瑞把莊園擴大為一千二百畝，改名振亞莊（也稱“段莊子”）。曾

先后将庄子交给他的部下秦宝臣、裴凤林和他的小舅子“张舅爷”经营。而这些人又各自转给自己的手下人和亲信管理，坐享“二地主”的清福。在“张舅爷”和裴凤林经营时，管事的是段祺瑞手下的爪牙杜江。实际上杜江成了振亚庄的三地主。

振亚庄开始是雇长工种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把地全部租了出去。段祺瑞从这块土地上，仅葦子、蒲草一项，每年就可搜刮去三千二百块银元，再加上地租，每年就要捞去五千多块银元！此外，还强迫农民们每月往城里败家送几次时令鲜菜，逢年过节要送鸡、鸭、鱼、肉等。

但这仅仅是大地主段祺瑞的一笔剥削帐，如果再加上二地主、三地主的层层盘剥，那么实际压在农民身上的重担就更为沉重了。

除了段庄子外，还有崔老公的藕合堂转到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手里，改名为“玉成庄”。清朝命官安宗恒的万义庄，也卖给段祺瑞手下的军阀张奎宾。这些军阀也都把庄园交给亲信经营，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层层剥削。

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以后，有的庄子又落到新军阀手里。国民党伪天津市长肖振瀛，从张敬尧手里买下了玉成庄和周围的土地，定名志远庄。志远庄由肖振瀛的亲表兄弟、原东北土匪头子谢国璽和堂兄弟肖振德等二地主直接经营。肖振瀛只派他的弟弟肖振相每年坐着小汽车来庄“巡视”几次。肖家两条看庄狗——谢国璽、肖振德，狗仗人势，为人阴险狠毒，无恶不作，是志远庄出名的两霸，

貧苦农民除了受地租沉重剝削外，还要遭受他們的欺压、蹂躪。

其他的庄子，如大白樓被封建官僚赵尔巽霸占，老三畝被伪济南稅务局长馬晓峰霸占，等等。

除此以外，美帝国主义的黑手也伸到苦海子里来，使海子里的人民苦上加苦，生活越发难过。

一九一八年，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奴役，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文化侵略据点——燕京大学。一九二二年，他們以“改良华北农业生产”为幌子，騙取了国民党政府七十万元农村“賑灾”巨款，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从軍閥张奎宾手里买下万义庄（現“建新庄”）。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駐国民党政府大使——臭名远揚的司徒雷登把庄名改为“华美”庄。在这里办起了所謂“农业試驗場”。門楼上飄揚着美国的星条旗，下边两个外国兵，荷枪实弹，来回巡邏。

“試驗場”每年雇二十多个长工和几百个短工，种植玉米、高粱、棉花、谷子等。美国人美其名曰“农业試驗”，实际上是实行疯狂的經濟掠夺和残酷剝削。

一九三三年以后，司徒雷登改变經營方式，把土地全部出租給当地农民，每亩收租二三块銀元。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坐在城里西河沿的官邸里，一年就从农民身上搜刮去三千多块銀元。

司徒雷登庄园的“法規”是：先交租、后种地；交不上租的驅逐出庄。几十年中間，不知有多少穷人被迫离开村庄，流落他乡逃荒要飯；又不知有多少人，让飢餓和沉重劳动夺

去了生命！在美国人压迫下的佃户们，不能在房前房后种一棵树，因为连房基地都是美国“老爷”“恩借”的。甚至佃户们不能有自己的茅房，一律要到东家盖的三个厕所去，名义上怕“有碍卫生与观瞻”，实际是借故吞掉全庄的粪肥。这就是道貌岸然的美国侵略者的贪婪霸道的嘴脸。

直到北京解放前夕，司徒雷登还不放弃剥削贫苦农民的机会，派人来搜刮最后一次地租之后，这个喝足中国人民血汗的侵略者，才夹着皮包滚蛋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闯进了这块土地，这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良棉改进区”，成立了所谓“博爱村”。日寇的“棉产改进会”在这里对农民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剥削和独裁统治。强迫农民一律种棉花，不准种高秆作物。违抗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毙。农民种地除了照纳租粮以外，还得按规定把种出的棉花，一律送到“棉产改进会”去换布，不得私自处理，不然，就要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强迫广大的贫苦农民在小白楼一带种十四顷地的苜蓿和一顷地的“棉花试验田”，贫苦农民每天在汉奸们皮鞭的监督下，去苜蓿地服苦役，稍微干慢一点，就要受到汉奸们的鞭打。不去为日寇干活的也要遭到毒打。人们累死累活干一天，男工只挣三斤又苦又涩的混合面，女工才挣二斤半。

人们盼望着晴天见太阳，可是赶走了日本强盗，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广大贫苦农民还是在地狱里生活。

从一九〇一年慈禧拍卖猎场开始建庄，直到一九四八



年解放前夕，近五十年的時間里，金星大隊所屬十八個大大小小村庄，哪一個村庄沒有一篇充滿苦澀和仇恨的歷史！在這樣虎狼橫行的村庄里，貧苦農民又到哪裡去尋求生路呢？

**來逃荒 剛離狼窩進虎口**  
**無活路 租佃扛活受煎熬**

如今，金星大隊各個莊子裡的老貧農、下中農戶，差不多都是當年在山東、河北老家沒法生活逃荒來的。據不完全統計，全大隊從外省、外縣逃來的占現在戶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當年，逃到海子裡來的窮哥們，實指望找到安身糊口的地方。但是哪裡知道，舊社會到處都是富人的天下，這裡也是窮人們“活不成，淹不死”的苦海子！貧農王元道，原籍山東汶上縣，老家裡地無一壠，房無一間，一家人就指着扛活、討飯為生。王元道長到十三歲時，扔下討飯棍開始給地主扛小活，十五歲那年，老家遭災，實在混不下去，爹、媽帶着他們兄弟仨和一個妹妹，逃荒來到北京南苑大白樓村。仗着窮哥們幫助，苦苦求情，向地主王連玉借了一間小破草房，一家六口人才勉強安下身來。他爹給地主生聿豐扛活，他扛小活，家裡沒吃的，求爺爺告奶奶好容易借來十五斤棒子，摻上野菜，娘兒四個一天只吃一小把棒子面。十五斤棒子，竟然吃了三個月。後來告借無門，無奈何連枕頭裡的一點谷秕子都吃光了，兩歲的妹妹吃不了糠菜，活活地餓死在媽媽的懷裡。王元道父子倆拼死拼活給地主扛活，到頭來

还是养活不了娘和两个弟弟。娘儿几个只好靠挖野菜根糊口。爹五十七岁那年，给地主生丰丰耙地，牲口惊了，拖翻了铁耙，爹被压到耙底下，连人带耙拖了好远，浑身上下拖得没有一块好皮肉。抬回家来，没有吃的，更没有钱医治，不几天就病饿而死。不久，他娘和三弟，因为长年挨饿，吃野菜根，都得了大肚子病。娘的病一天天严重，临死时对王元道说：“我不行了，我死后，你想法带着两个弟弟活下去吧。”妈妈死了以后，二弟也饿的得了浮肿病，全身肿得走不了路。三弟的大肚子病也更重了。听说南苑镇有个中医能治大肚子病，王元道便想法借了点钱，借个小车推三弟去看病。不料走在半道三弟就死了。

就这样，王元道一家逃出了鬼门关，又踏进了阎罗殿，仅三年工夫就被苦海子夺去了四个亲人。

穷苦的人们带着希望从四面八方逃荒来到海子里，在这里照样饱受天灾人祸的摧残。结果还是活不下去，只好背着新的痛苦，又逃出苦海子，流落他乡。贫农李金才全家由河北景州逃荒来到海子里，讨饭、打短、扛长活、拉洋车，什么都干过，干什么都维持不了生活。全家又逃到宣化去求生，照旧扛活、打短卖命干，全家还是吃没吃穿没穿。不料祸不单行，全家又遭上伤寒，没钱医治，差点送命。在宣化仍然活不下去，只好又逃回海子里。

“穷人面前路三条，家破卖儿把荒逃。”多少年来，人们从外地逃到这里，又从这里逃到外地。但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天下财主都是害人精、吃人虫，旧社会到处都是虎狼当

道，哪还有穷人的活路！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解放前，全大队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手中。按土改时统计，当时地主、富农九十四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十，却占有耕地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亩，占总耕地百分之八十六点五；中农贫农八百五十三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只有土地三千八百零五亩，占总耕地百分之十三点五。而许多贫雇农则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垧。

这里的农民同其它地方的农民兄弟一样，受着地主阶级沉重的地租剥削。不同的是除遭受大地主一层剥削外，还要忍受二地主、三地主甚至四地主的层层盘剥。在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振亚庄里，压在农民头上就有四层地主。这些地主层层转租土地，挖空心腹，用尽心机，吮吸农民身上的膏血。以三、四两层地主为例：四地主范秉程、杨凤翔，以每亩二斗七升租粮从三地主杜江手中包来土地，转租给农民时，却把地分成三等九级，每亩租价起码三斗，稍好些的地四斗、五斗不等，头等地租，每亩租价竟然高达一石！这是多么惨重的剥削啊！

但是这还没完，贪得无厌的地主们还要在地亩上打坏主意。当时，地主出租土地时用小尺丈量，而且是“道打当心，沟打底”，连沟道都一包在内，这就是这里地主惯用的剥削手段：“八当十”。贫农高宜修租了老三舍二地主常凤岭“八当十”的“春翻碱，夏怕涝”的八亩盐碱地，玉米棒子长得象老鸱头，八亩地一共打了五石来粮食，但是租粮交了四

石四，到头来只落得六斗多粮，这就是辛辛苦苦劳累一年的“收获”！人们编了这样几句满含辛酸的顺口溜：“春天就怕地翻碱，夏天又怕连阴天。八月十五中秋过，交上租子就玩完！”

当时，租地都是事先议好租价，写在租约上的。碰到灾年歉收，农民砸锅卖铁也得按租约交租，少一粒也不成。但是地主却是“两本皇历，铺一本，盖一本”。他们看到年成稍好一点，就可随意涨租。振亚庄贫农霍明玉，租种了四地主杨凤翔十亩地，快收秋了，四地主到地里一转，看庄稼长得好一些，就把地租由原来议定的三斗二增加到五斗。霍明玉要跟他说理，四地主坐在椅子上高高地翘着二郎腿，斜眼看了霍明玉一眼，轻蔑地说：“老子的地，你不种，有的是人抢着种。你嫌租子重，我还嫌你这穷骨头把地都种薄了呢！不种，就给我滚！”霍明玉怕夺佃，只好把满心的愤恨咽到肚子里。贫农陈殿有租种四地主杨凤翔几亩地，四地主看到土地越种越好，第二年就把地租由三斗增到六斗，第三年竟然增到一石！这样重的地租谁交得起呢？陈殿有只好退佃打短，另奔生路。

佃户交不起租，就要被赶出庄；要想不出庄，就只有忍受高利贷的剥削。高利贷是五分利，春借一石，秋还一石五。而且春天借麦子，大秋里佃户没有麦子，得到地主开的斗局子低价卖棒子高价买麦子还债。秋天借棒子，来年麦收时佃户没有棒子，不得不“一顶一”地用麦子还棒子债。抛开利息不算，单这一折一顶，佃户要被额外榨去多少血汗！

租地不好过，扛活更难熬。很多贫苦农民租不起地，只有靠扛活、打短来糊口。地主对长工、短工的剥削也是极为残酷的。寿保庄地主段发科，为人狡猾，剥削手段毒辣。穷哥们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要吃段家饭，得拿命来换！”这句话深刻地道出了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惨重狠毒。在段家扛活，条件非常苛刻：“年少不要，老了不要，二三十岁，做活正好。”干活时，“不歇晌午，摸黑起早；早起挑水，晌午锄草；五更喂驴，不能睡觉。”一般长工的遭遇是：“得了场病，东家不要，赶出门外，饿死算了。”

段家地主对待长工除了实行硬手段以外，还扎软刀子。段家老二会说几句古书，夜晚在场院里说书，让劳累了一整天的长工一边听书，一边继续给他们剥棉桃、劈棒子。不仅如此，段二还常胡诌一些“因果报应”、“不为今生修来生”等鬼话，麻痹长工反抗意识，好死心踏地为他们卖命。

对长工是这样，对短工的剥削花招更毒了。春秋两季农忙时，段家每天上“人市”一叫就是几十号人。穷人们起五更来了，肚子里粒米未进就得下地干活。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段家故意不送饭，直到过了十点才让短工吃“早饭”；这当儿饿急了的人不干了，气走了；饿软了的人干不了，被段家赶走了。一天下来，干活的人不少，吃饭领工钱的人却不多。穷人们中途饿急了气走了的，白干了半天；即使勉强干下一整天领到工钱的，也累得半死。

段家地主越富越歹毒，甚至在长工们吃的窝窝头、咸菜上，也使坏主意。长工刘群曾编这样一句顺口溜：“棒子面，

大糙籬，咸菜条子赛房柁。”这样，一則做起来省工夫，二則吃起来败胃口，省粮省菜。

长工身上有一点油水沒榨干，地主們也是不甘心的。地主們常說：“天底下要两条腿的牲口沒有，要两条腿的扛活的多的是！”这一带的长工們到地主家扛活，要事先向直接經營土地的三地主或四地主送礼才成。礼物收下了，說明活找妥了；礼物退回来了，是嫌礼少、礼不好，得重买重送。狠心的地主真是“閻王爷深怕鬼不瘦”。一个穷扛活的，連自家的肚皮都顾不过来，哪里有錢送礼？长工們編了这样的順口溜来傾吐自己的苦情：

地淨場光衣裳破，            要穿新的另找活，  
送了礼物有活干，            无錢送礼干沒轍！

### 强盜兵 制造惨案发兽性 “刮民党”强征勒索害人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卖国政策，在饱受地主阶级摧残的海子里人民头上，又加了一层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四天清晨，日本侵略軍突然包围了团河。当时駐扎在团河的中国步兵营，受到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对日本侵略軍进行了英勇頑强的抵抗。但是由于仓促回击，加上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步兵营向团河行宮內駐的騎兵营求援，而騎兵营的营长回答說：“蔣委員

长有令在先，不准抵抗！軍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本职爱莫能助。”步兵营只好孤軍抗敌，从早到晚奋战了一整天，伤亡惨重，抗到深夜不得不突围撤出团河。

随后，日本强盜手持火把，从村东闖进村来，見房就烧，見人就杀，見东西就搶。对手无寸鉄的农民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农民赵連清扶着母亲，刚出門口，准备南逃，就被站在土包頂的日本强盜开枪打死。一个老太太拉着小孙子，好不容易从着火的房子里爬出，就被一个强盜儿刺刀挑死在当院里。日本帝国主义者烧杀了一陣之后，又到处搜查搶劫，然后才离开团河村，向北边济德堂搜索。在出村路上，这些野兽逮住了刚逃出村去的于治久。到了济德堂，强盜們又逮住了沒有逃走的十七个长工，强迫这十八个人替他們宰杀搶来的牛、猪、鸡、鴨，烧水作飯。等这些野兽吃飽喝足了之后，又把十八个无辜者捆绑起来，关进一間黑屋里。

第二天清晨，强盜們把十八个人拉出来，一个日寇軍官对他們作出一幅笑脸，哇啦哇啦地叫道：“皇軍大大的好，你們的为什么抵抗，良心大大的坏了。”只見十八个人对他怒目而視，一声不响。日寇見軟的不行，就叫他們排成一排，周围用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直对着他們，然后命令强盜兵挨个摸心口窩，并且凶神恶煞般地宣布說：“誰的心跳，誰的心就是大大的坏了，統統地刀挑的干活！”十八个人在刺刀的威逼下，仍然巍然挺立，一动不动，气得强盜大声吼叫道：“統統的死了死了！”一陣疯狂的屠杀，有十七位无





楊永青 图

辜者全部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最后只剩下于治久一人，强盗们用大刀把他劈倒在地上。

离村前，这些日本侵略者又用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双手，把昨天晚上没有烧完的房子都点上火，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敌人满以为这场惨案的所有中国目击者，都被收拾光，这样就可以脱逃杀人的罪恶了。但是，于治久并没有死。敌人走了许久以后，于治久从血泊中甦醒过来，只觉得浑身麻木，疼痛难忍。他回忆起刚才日寇的暴行，十七个阶级兄弟的惨死，他产生了一个顽强的念头，他要活下去，要记住这笔血海深仇，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罪行。他强忍着锥心的痛楚，藏在尸体中间，挨到了夜晚寂静无人时，才悄悄爬出尸堆血泊，被乡亲们救活了。他是这次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日本强盗在这块土地上犯的罪行，何止这一件！金星大队世世代代的农民都不能忘记，当年在永丰庄发生的另一件惨案。一九三九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住在南苑机场的日本兵出来巡逻，来到永丰庄，被当时庄里仅有的八个长工拿起地主张子仪护院的长枪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是出乎强盗们意料的袭击，打得强盗们措手不及，狠狠逃回南苑老巢。

强盗们吃了亏，哪肯罢休？连夜开来大队人马，把个小小的永丰庄围得水泄不通。强盗们一个个如临大敌，头带钢盔，端着刺刀，架起机枪，疯狂地向村庄扫射；长工们也奋

勇抵抗，相持了四、五小时。强盗们见这小小的村庄竟然打不进，气得哇哇地怪叫，点起火来烧村庄。

长工们的子弹打光了，他们计议：与其在里面被火烧死，不如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当长工们向外突围的时候，由于敌人多，枪弹密集，有七个人不幸中弹倒下。当强盗确信抵抗他们的就是这几个英勇的长工的时候，真是羞怒交加，立刻挥舞着刺刀向七个中弹的长工身上刺去。灭绝人性的强盗兵还不解气，又把他们的尸体扔到火堆里烧成灰烬。

在日寇的兽行面前，当地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他们把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深深地埋进心底，盼望着解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年抗战胜利了。这个消息，多么振奋人心啊！谁知赶走了东洋狗，又来了黑心狼。国民党反动派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大地主、二地主、三地主等的重重盘剥下，已经是饥寒交迫，奄奄一息，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敲骨吸髓，除了什么田赋、征粮，还有那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重重地压在贫苦农民身上。什么大乡费、保甲费、壮丁费、青苗费、办公费、油料钱、草钱、兵役税、地方附加税、国防特别捐……，合起来每人每年要交一石左右的粮食。交了地租连口都糊不住的贫苦农民，到哪儿去凑这些粮？况且，地主雇人看青，为什么连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哥们也要出青苗费；伪乡长、保长、团丁等这一帮地主阶级的走卒、看门狗，他们大吃大喝，凭什么要贫苦农

民出錢养活他們？

地亩捐，本来應該是地主自己納的，老三畚的二地主伪南苑鎮長常凤岭，仗勢欺人，却把地亩捐加在佃戶身上。貧农陶樹德向常凤岭租地时，租契上除了写明每亩地應交的租子以外，还特意注上一笔：“地内亩捐一切花費均由租种人負担，与出租主无干！”这“一切花費”就是包括“地亩捐”在內的。这是利用所謂的“法律手續”，公开进行搶劫。

敌人越是临近死亡，越要拚命地掙扎，通过各級爪牙疯狂地抓兵搶粮。志远、“华美”、振亚等庄的恶霸、軍統特务、伪保長裴廷祥，每天挎着枪带着兵到处騷扰。弄得人們有家不敢呆，有地不敢种，到处躲藏。年輕人，十天半月地躲在“青紗帳”里。餓了啃口生棒子，渴了喝口苦碱水。貧农陈朝新，一連在野地里躲了二十多天。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勞力，地里庄稼都荒了。一天，他忍不住回家看望一下，不料，刚走出庄稼地不远，两把刺刀就对住了他的胸膛，被裴廷祥五花大綁地送往伪大兴县县政府，以“抗兵”的罪名关了一个多月。这时裴廷祥放出口风說：“贖人可以，有两石粮食一头肥猪就成！”陈家救人心切，到处拼湊，好容易弄了两石粮一头肥猪交給了伪保長。但是陈家的人还是不見回来。直到北京解放前夕，陈朝新才逃出了国民党的監牢。

又有一次，裴廷祥带着几个“自卫团”团丁去“华美”庄抓兵，貧农青年于占海来不及躲藏，被抓走了。走到半道，于占海趁团丁不注意，掙开繩子跑了，裴廷祥掏出手枪朝着于占海“啪！啪！”就是两枪。幸好人已跑走，沒有打中。裴

廷祥見自己枪法不灵，第二天气急败坏地带着狗腿子，大搖大摆地闖进于家，进大門就嚷道：“快賠老子兩顆子弹費！”于家莫名其妙，申辯了几句，裴廷祥竟恬不知耻地說：“誰让你家的人跑呢？他要跑，这两顆子弹老子就不会打！”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被打的人，沒被打中要賠子弹錢；那么打中了，誰又給偿命呢？当时裴廷祥有权有势，穷苦人惹不起他，只好請他吃喝一頓才算罢休。这个地头蛇、土恶霸，不仅到处抓丁，而且到处搶粮，鬧得人們啼飢号寒不得安宁。

国民党統治时期，站在团河一带人民头上的还有王景岑（日寇的铁杆汉奸、国民党軍統特务，杀害过我地下工作人員）、于文泰（地主、伪保长、伪副乡长、“自卫队”长）、于治田（土匪、反革命分子，杀害过我地下工作人員二人）和袁德祿（地痞流氓）等四大恶霸。

恶霸于文泰，因为貧农魏兴借住小学校的房子沒有給他送礼，他就带着打手几次三番来魏家敲詐勒索，見榨不出油水，就把魏家的东西，搞个稀烂扔在外边，还强令魏家搬走。魏兴的母亲連气带急，被活生生地給逼疯了。从此，她精神失常，整天痴痴呆呆，嘴里老是重复着一句話：“于文泰，我忘不了你！”逼疯了魏兴的母亲不算，于文泰又在魏兴身上打主意，要抓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去当炮灰。魏兴眼看着母亲病势越来越重，家里一連几天揭不开鍋，一狠心就卖身当了兵。于文泰把中农徐大娘的独生子徐亚新抓去当兵，徐大娘到保公所跟他讲理要人，被他一頓拳打脚踢，受了內伤，回家后几天就死了。貧农王芝性也是独生子，在地

窖里藏了二十多天，看着总也脱不过，就狠狠心卖身当了兵。当时讲好十八石玉米，伪保长于文泰借口要扣“手續費”，只給了王家六石玉米。

在那个年头，兵变匪，匪变兵，兵匪横行。穷苦百姓家，前門刚刚送走了“正規国軍”的“兵老爷”，后門又闖进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匪大人”。海子里几乎所有的庄子都遭受过土匪的搶劫。鬧得人們晚上都不敢睡在家里。

一九四七年冬天，貧农霍明玉实在沒法熬过寒冬，便东求西借了一石棒子送禮，求得三地主杜江“开恩”到泡子里打葦子，打了葦子倒三七分成（杜得七分、霍得三分）。土匪白汉臣知道这桩事以后，硬要抽“干股”，不打葦子光分錢，而且連他姨、他姥姥都算上了，一共是十八股。这岂不是道道地地的砸明火嗎？霍明玉一听干脆不打了。可是土匪白汉臣掏出枪来威胁霍明玉說：“不打？老子的这玩艺儿可不是挂在身上吓唬麻雀的！”結果霍明玉辛苦一冬打完葦子，才落得一石多棒子，刚刚够抵上送禮时欠下的亏空。其余的都叫土匪給敲詐去了。

五十多年来，这一带的穷苦农民就是这样在地主階級的层层沉重盘剝下，在封建皇帝、帝国主义以及軍閥匪霸的残酷統治下，艰难地苦熬着，斗争着，盼望着太阳早些出来，照亮海子里这个人間活地獄。

## 二、翻身篇

获解放 乌云四散见青天

闹土改 斗倒地富把身翻

太阳终于出来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宣告了吃人的旧制度的灭亡。北京郊区解放了。

这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深夜，济德堂村贫农白玉善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老乡，开开门！……”他便立刻警觉起来。这个祖辈三代给人扛活的贫农，从山东老家逃荒来到济德堂，扛活、打短拼死卖命，妻子好不容易给他缝了一件棉袄，白天当衣穿，夜晚当被盖，不料，在前两天夜晚突然被闯进来的两个国民党匪兵给抢走了。他这时迟迟疑疑地开了门，门口站着两个人，和藹地向他说：“老乡，给我们带一段路行吗？”他们见白玉善只穿了件单薄的小破棉袄，立刻从身上脱下军大衣给白玉善披上，并告诉他：“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过去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军队。不信您摸摸这军大衣。”白玉善摸了摸军大衣是粗布的，看了看帽子上也没有国民党的帽徽。他想：“咱在山东老家见到的八路军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激动得一把抓住两个同志的手，二话没说，就迎着寒风走出去，给自己的军队带路。走在路上，尽管寒风刺骨，但他的心窝里却是暖烘烘的。

随后不久，每个庄子都开了解放军。他们不仅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穷人扫地、担水、打柴，亲



如一家。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感动地说：“俺活了一辈子，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呀！”

一九四九年冬天，海子里的人民解放还不满一年，土改工作组就来到了各个村子。经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领导农民成立了农会组织。接着各乡派了农会代表，志远庄乡（包括志远庄、大生庄、宁海、建新庄）是苏树业、李金才，团河乡（包括团河、济德堂）是白玉善，南同顺乡（包括南同顺、老三畚、新三畚、北同顺、寿保庄、大白楼、小白楼、振亚庄）是于凤池、吴玉刚等。这些代表到南苑区学习“土地法大纲”和党的土改政策，三个月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乡里，和土改工作组一起，领导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开始了。早在海子里人民临近解放的前夕，一些大地主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大势已去，他们便赶紧卖房卖地，疏散浮财。志远庄大地主肖振瀛的弟弟肖振和把二十四顷地和全部房产包给伪保长、国民党党员、军统特务分子裴廷祥、郑瀛洲、裴春波、邵景怀、刘士奎等五人，转手倒卖给农民。他们事先放空气说：“肖家要卖房卖地啦，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外庄还有好些人想买地哩！咱们是老街坊了，照顾大伙儿先买吧！不早买就叫人家抢走啦！”见使软的农民不买，他们又收起“老街坊”的笑脸，恶狠狠地威胁说：“哼，谁不买，谁就得马上搬出庄子滚蛋！”在他们的威逼下，庄里有二十三户贫农不得不借债买下肖家的地。

一些大地主变卖了财产，捞了一笔钱逃跑了，一些中小

地主无处可逃，便分散土地，隱瞞财产，妄图逃脫斗争。团河地主赵英，把在南苑鎮放的四十石粮的高利貸隱瞞下来，又在他妹妹名下頂了二十亩地。志远庄反革命分子裴春波也突然“开明”起来，把离庄子又远又次的八十亩地交給了当时的临时农会，把大騾子、大車让給缺牲口的农民左宝权、刘玉岑、金振福等人随便使用。但在背地里，反革命分子裴廷祥却恶毒地咒罵道：“分地沒关系，这是老子給儿子的！”还叫囂：“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小日本那么凶才呆了八年，八路軍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穷小子們，想跟老子斗，这叫洋車上馬道——沒轍！”

与隱瞞财产、恶毒咒罵恐吓的同时，階級敌人还施出了更为毒辣的一招。团河地主、反革命分子王景岑的父亲王志云，想到自己树大招风，不能打进农会的內部，便串通济德堂富农霍万林和地痞小偷王富貴，慫恿他們伪装积极，掌握实权。霍、王二人钻进农会內部以后，王志云便杀猪摆酒請村干部吃喝。把自家的好房让給村干部住，进一步拉攏和腐蝕干部。王志云自以为得計，就猖狂地活动起来，秋收时，他一方面硬逼着张清德、黎荣德、徐天恩等十三戶佃戶給他交了租子。另一方面和霍万林密議，布置被他收买的干部監視群众，控制会场。在召开群众会议的时候，那些被他們收买的干部便千方百計阻止群众讲话。群众刚要发言，他們就用碰肩膀、瞪眼睛来加以威吓、阻止。

工作组跟基本群众在一起和敌人展开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工作组同志一方面繼續深入群众，訪貧問苦，个别串

連，一方面把被地主收买了的村干部調开单独开会。这样一来，广大貧农、下中农敢讲话了，在翻身訴苦会上，群情激憤，揭露了敌人的罪惡和阴謀活动，十三戶佃戶控訴了地主王志云强迫交租的罪行，群众一致議决，追回王志云强迫交的租子。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

但是，階級敌人絕不会死心，在訴苦会的当天晚上，地主王志云偷偷跑到佃戶家說：“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要回来的，你們要識时务一些，免得吃亏！”他对佃戶徐天恩先是气势汹汹地說：“你他媽的不識好歹，忘恩負义了，从外地餓得要死逃来，老子让你住下給你地种，把你养活了，現在說起老子的坏話了，你給老子滾出村去！”接着又堆下笑脸湊近徐天恩說：“你要想不搬出村也好办，那你明儿去工作組向他們說，不是王某要你交租，是你自个儿願意。”徐天恩这个給地主扛了三十几年长活的老实庄稼人，受尽了地主的剝削和压迫，从外乡逃来团河，托人說情租种了地主王志云的地。解放了，他翻了身，但一时觉悟还不高，还不相信自己真能翻身。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工作組，把昨晚地主叫他說的話說了一遍。工作組同志看出了他的心思，耐心地启发他的階級觉悟，对他說：“有党和人民政府撑腰，只要咱們穷哥們大伙一条心，抱住团儿，地主是不敢再欺負咱們的。咱們可不能中了敌人的奸計啊！”受了一輩子苦的徐天恩听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他哭着揭发了敌人的阴謀，并說：“咱不能这样窩囊，党和政府給咱撑腰，領導咱鬧翻身，咱要揭开地主的老底子，紧跟着党鬧翻身！”

地主、富农們破坏土改的阴谋詭計被粉碎了。群众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广大貧农、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整顿了农会組織，清洗了钻进来的敌人。农会发动群众，继续检举和揭发了敌人的阴谋，搜查敌人埋藏的粮食、地契，接着各村分别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南同順乡先后斗争了四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段发科、戴云亭、胡寿田、王連玉。群众愤恨地称他們为“四大魔”，还編了順口溜，表示他們斗倒敌人的信心和欢快：“打倒王連玉，人人有土地；打倒段发科，人人有吃喝；打倒胡寿田，人人有衣穿；打倒戴云亭，人人得安宁。”团河乡斗争了地主王志云、张广治。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下的农民，第一次揚眉吐气地站立起来了，掌握了刀枪子，对敌人实行了专政。

分土地开始了，各个村的男女老少，兴高采烈，敲鑼打鼓，庆祝这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喜事。人們奔走相告，三个一帮，五个一伙，唱着刚刚学会的革命新歌曲，簇拥着往田里走去。

在志远庄的一块田野上，插上了写着“张文起”名字的木桩子。土改工作組的同志对貧农张文起說：“大哥，从今以后，这块地就是你的了。”张文起激动得滿眼泪花說：“我家一老一小，我爹是瞎子，我又是个瘸子，过去給地主扛活都不要。今几个毛主席把地分給我种了，今后地主們还跟咱穷人要不？……”他的話还没說完，一个老农民就半逗笑地說：“你呀！还蒙在被窩里睡大觉哪！”这句话引起一陣欢快的笑声。

张文起站在地头上，久久不肯离开，等分地的人走远了，他蹲下身来，用一双結滿老茧的手，捧起一块黑糊糊的泥土，紧紧地貼在心窩上，激动得臉上挂滿了泪珠。

全大队六百多戶貧农、下中农，一共分得两万多亩土地，一百八十多間房屋，十三輛大車，十七头牲口，所欠地主的債也一笔勾銷了。从此，当牛当馬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土地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手里，广大貧农、下中农跟着党鬧翻身的热情，象开了閘的河水，冲刷着旧社会的渣滓，滾滾向前奔去……。

每个村里大土墙上，都写上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語，許多人家都将毛主席的象挂在屋中央，表示他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心情，表示他們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里培养鍛炼了一代革命新人，第一批无产阶级先鋒战士成长起来了。老貧农苏树业、白玉善、吴玉刚等十五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些庄子建立了党支部，有了战斗司令部。广大翻了身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学文化 立志誓作新农民**  
**試种稻 事实面前认真理**

土改以后，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翻身的喜悅籠罩着每个村庄。广大貧苦农民不仅要在經濟上、政治上翻身作主人，而且立志要在文化上翻身。一九五〇年冬，各个



高振美 图

村庄，普遍办起了民校。

“办民校了！”这是土改以后第一桩喜讯。人们一个个兴奋地相互传告。特别是年轻人，成群结伙地唱着歌到民校报名。上学的有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娘，有三十几岁的成年人，有几个孩子的妈妈，有青年小伙子、大姑娘，还有许多少年儿童。在振亚庄里，上民校的人达到了成年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

学员们劲头很足。没有教室他们自己动手盖，没有油灯他们自己凑钱买。每天夜晚，屋外北风呼啸，屋里热气腾腾，人们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着。

在建新庄的民校教室里，学员们正在练习写字。突然，贫农张保和把笔杆摔在桌子上，嘴里嘟囔说：“咱拿锄板耨一天大田，肩上担它二百斤都不含糊，如今倒叫这个小玩意给降住了。咱不是这里的虫！”原来他练习写“乐”字，一连写了五六遍，弄得满头大汗写不好，别人又把着手教写了几遍还是不行。这时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开腔了：“咱们祖祖辈辈几代都是横放着扁担不知道是‘一’的睁眼睛。到咱这一辈要摘文盲帽子，就得有耐性，俗话说：‘天下无难事，铁杵磨成针’嘛！”

可不是吗，解放前，贫苦农民连肚子都混不饱，哪还有钱去读书？如今当了国家主人，管理国家大事，却不能读报，不会记帐。上级来了指示看不了，听了报告不会作记录，全凭脑子记，怎么开展工作呢？

张保和这个小伙子，在同伴们的鼓励下，他想，从咱记



事起，咱爷爷、爹都不識字，受了地主多少騙，如今毛主席叫咱讀書識字，咱倒退坡了，这还叫什么翻了身的农民。于是，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重新拾起笔，又埋头写起来。以后，他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勤学苦练，走路时练习背课文，吃饭前用筷子在桌子上练写字，躺在被窝里在肚皮上写，地头打歇时，捡根秫秸写。时间不亏有心人，不到两个月的工夫，他终于学会了一千多字。

民校使很多不識字的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还培养出一些能写会算的干部，如现任党总支宣传委员董志隆、团总支书记楊国强、党支书苏树业、魏兴等同志，都是在識字班学的文化。

各村的翻身农民，除了办民校、讀書識字外，还活跃了文娱生活。团河村訂立了“爱国日”，村里有近三十个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配合政治宣传，經常給乡亲们演出一些文艺节目，如《白毛女》、《刘胡兰》、《夫妻識字》等，在抗美援朝时，演了《送炮弹》和以日寇在济德堂暴行为題材編演的話剧，等等，很受群众欢迎。很多老人激动地说：“现在真是翻了身，这是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

在海子里，整天蕩漾着快乐的歌声，大人、小孩嘴里都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到处是一片快乐的、欢騰的、充滿革命朝气的景象。

生产上更是朝气蓬勃。許多人家起五更睡半夜整天在地里拾掇。人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上庄稼，爭取好收成。

但是要在低洼盐碱地打出粮食来支援国家，只有变旱地为水田种水稻，南苑镇一带已经有人种水稻。“种水稻”这个念头，特别吸引了地势最低的小白楼的翻身农民。小白楼的地势，象个大锅底，是个有名的“蛤蟆坑”。别的地方小涝，这里大涝；别的地方不涝，这里也涝。

开稻田，吃大米，这是这里的农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桩新鲜事，引起了纷纷议论。一些老人想起了历史上失败的例子说：“过去九门提督江朝宗在济德堂一带开稻田，结果春旱没有水，连稻芽子都没养出来，他多大势力，都没鼓捣成，咱们也难呀？”一些人坚决反对：“咱们这儿是北方，只能种棒子、高粱，要种水稻，那叫瞎折腾！”有些好心人出来和稀泥：“刚分了地，过上几天好日子，我看咱们还是安安分分的好！”更多的人却坚决要种，他们说：“旧皇历翻不得，咱们今天翻了身，有党的领导，江朝宗他能比得上咱们？再说，南苑镇一带也是北方，他们开成了稻田，咱们怎么就开不成？”经过一场争论，人们统一了认识，决定开稻田。

人们说干就干，立即成立了一个“开稻田委员会”，由共产党员王吉祥任主任委员，贫农师长禄、张福海等四人为委员。紧接着是“投地”，全村五十户有四十五户一共自愿投地四百亩。商定了出工和分配的办法，每投十亩地出一个劳力，投五亩地出半个劳力。秋后分配也按这个比例办。

政府也大力支持，贷给了四亿元（合币制改革后的四万元）农贷款作为挖河、打井、架高压线、装变压器、安电动机

的資金。

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育秧時，遇上了春旱，夏季插秧了，需要大量的用水，正在這骨節眼上，當時由奸商們包打的竹管井不靈了，出水量比合同上規定的小得多。儘管區政府支援了一台抽水機，日夜不停地從泡子裡抽水灌地，水仍舊不夠用。再加上插秧時正趕上春秋大忙，個體農民都忙着先收自家的麥子，無法統一安排勞力，結果四百畝稻地，只插上了二百多畝秧，其餘近二百畝地荒廢了。

這一年秋收時，雖然插上秧的稻田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好收成（平均畝產量三百五十斤，最高達到五百多斤），但是由於荒廢了將近一半的土地，加上欠下國家一大筆貸款，如果第二年繼續種水稻，就要重新打井、挖河、增添設備，勢必還要向國家貸款，這是當時單干農民負擔不起的。經過大伙討論，不得不把開出的稻田，移交給南同順國營農場，由農場來償還國家貸款。

小白樓種水稻這件事，雖然暫時擱下了，但是它卻用生動的實踐，向這一帶的農民證明了，低洼鹽鹼地是可以改造的，不僅可以種水稻，而且還能獲得較高的產量。同時，也在農民心窩裡埋下了一顆真理的種子，要想由窮變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單干不成，必須組織起來。

翻身農民的政治熱情也空前高漲。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中，為了保家衛國，廣大的農民積極向國家交售公糧，賣余糧、棉花，踊躍捐款購買飛機大炮，送子送郎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用實際行動支援了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

但是，正在广大人民奋起抗美援朝的时候，海子里的牛鬼蛇神，却应合着盘踞在台湾的癞蛤蟆乱喊乱叫起来。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裴廷祥、邵景怀、裴春波、生聿丰（解放前当过韩复榘的军需主任、伪国大候补代表、国民党党员、汉奸、特务，曾逮捕和杀害我地下工作人员，是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家伙，解放后隐瞒罪行逃了回来）等，伺机蠢动起来。

裴廷祥猖狂地咒骂贫下中农和干部：“苏树业没有三方豆腐高，尿不出一丈二尺尿去！”还凶狠地说：“等老子反过手来，卖二十亩地，置把盒子枪，先活埋苏树业，再干掉李金才，捎带着别的穷鬼！”他们采用了反革命两手，一方面猖狂地向人民进攻，一方面腐蚀和拉拢干部。他们为了控制农会，刺探农会情况，便请一个农会干部吃吃喝喝，讨亲近“关心”他，借牲口给他使，终于把他拉下了水。

敌人的种种活动，引起了海子里农民的高度警惕，也激起了他们的阶级义愤，纷纷检举敌人的罪行。

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依法逮捕了裴廷祥、生聿丰、于治田、裴春波、邵景怀、刘士奎、于文泰等人。根据他们的罪恶，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裴廷祥、生聿丰、于治田，对其它反革命分子也分别给予法律制裁。

伟大的镇反运动，击退了反革命分子疯狂的反革命活动，镇压了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犯罪分子，搬掉了长期压在农民心上的大石头，人人拍手称快。广大农民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

此，掀起了大搞农业合作化和生产斗争的新高潮。

### 三、合作篇

互助组 难塞阶级分化路

闹合作 誓作革命火车头

一九五一年前后，这一带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三十多个长期互助组和大量临时互助组。这些互助组在解决贫苦户缺牲口、少农具的困难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互助组的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一九五一年夏天，遇上了涝灾，地里苗草一齐长。好不容易盼得天气放了晴，组员们谁都惦记先给自己除草抢荒。先抢的自然高兴，自家的地一时没有抢上的就嘀咕说：“净给他们抢了，咱秋后吃谁去呀！”干活打不起劲，活茬做得粗糙，又引起先抢荒的不满。有的互助组里大伙争吵得脸红脖子粗，不得不暂时散伙，各顾各的。当时农民中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成夏争秋垮台，要想互助明年再重来。”这表明互助组解决不了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

同时，土改后，一些社员和干部产生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革命到头的思想。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也抬头了，土地雇人耕种，自己拴起大车，拉脚搞投机生意。团河村几户富裕中农一时唱出这样的小调：

地里滚一天儿，  
不如车轱辘转一转儿。  
鞭儿响，车轱辘转儿，  
春种秋收雇人忙乎，  
咱吃小磨香油雪白面儿。……

怎么办？难道革命就此到头了吗？下一步路怎么走？许多党员、干部、贫下中农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党及时给农民们点起了指路明灯。一九五一年冬，中共北京市委在东直门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一九五二年冬又在长辛店办了一次，海子里各个村党支部书记苏树业、白玉善、吴玉刚……等都参加了学习。在训练班里，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九四三年的指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sup>①</sup> 训练班领导同志又打了一个形象而又生动的比喻说：“咱们共产党员好比是一个火车头，火车的最终目的地是共产主义。火车要一站一站地走，但永不停止，一直往前开。咱们共产党员要做革命的火车头，就要一直开往共产主义，不能刚刚走过一站，就停住不走了，认为到

<sup>①</sup>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34 页。

了头了。要是停止不走，那还是什么火车头呢？”这些话给了苏树业、白玉善、吴玉刚等人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在训练班里，批判了革命到头的思想，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办合作社”、“共产党员要作革命的火车头”，这几句话牢牢地印在团河村党支部书记白玉善的脑子里。他想到村里的阶级分化，想到穷哥们儿的困难。村南贫农孙敬贤土改时分了十九亩地，手头连个锄板都没有。为了种这十几亩地，他村里村外豁出力气给富裕户帮工打短，给人家耙地，给沟，施肥，撒种……一切活全都干完了，才忍痛每天用一元二角租金租来一头牲畜，借来农具，耕种自己的十几亩地。前头耕后头播，活茬老赶不上节气，秋后收成，还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而村里那些富裕户，却是割尖了脑袋瓜钻发家致富的道。有的人趁雇农大老徐生病的当儿，掏出一百块钱买下他的十亩地；有的人花费不多的几个钱，买来中农黎士清的一头大黄牛。白玉善想：毛主席领导咱，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翻了身，绝不能再让咱穷哥们儿过着“炕头子火热，炕脚子冰凉”的生活。咱是共产党员，要做火车头，要使咱穷哥们儿风雨同舟，一道奔共产主义！

在一次区委动员办社的报告会后，区委把白玉善跟鹿圈等几个地方支部书记留下来，一道研究建社的事。区委张书记提议以团河村的一个互助组为基础，在团河搞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点。

张书记问白玉善：“老白，团河这杆大旗由你来打成吗？”

白玉善听了张书记的建议非常兴奋，立即坚决回答：“毛主席交给咱的旗，咱拼死也打到底”！

党支书 一马当先开路  
贫雇农 欢欣鼓舞入社

从区委回来，白玉善立刻找互助组的组员商议起办合作社的事来。

办社的消息，象及时春雨润泽了贫下中农的心。市委、区委及时派来了工作组，村里群众一连开了二十几天群众会，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在会上会下向群众交待自愿和互利原则，讲清道理，做个别串连和解释工作，使群众懂得办合作社的好处。在群众大会上，充分讨论和酝酿了土地入股，牲畜、农具、大车作价和劳力计工取酬、按劳分红等项具体办法。

在酝酿的过程中，人们记起了大生庄和南同顺国营农场的情况。那是在一九五〇年，快到清明节的一天大早，嗒、嗒、嗒……一阵清脆的马达声响彻了云霄。这响声吸引了周围的农民，扔下手里的活，跑来看“稀罕”。只见拖拉机犁过的地方，土地平平整整地翻转过来了。有的人伸手一量，足有七八寸深，惊异得吐出舌头说：

“好家伙，犁得这样深呀！这玩艺儿真棒！”

“嗨，这玩艺儿不吃草，不吃料，也不合眼打盹儿，真行。”

“你的大骡子大马能比得了这个？”

“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敢情当真有这事啊！”



人們議論紛紛，一大幫一大幫跟在拖拉機后面。孩子們看得不願回家吃飯，上年紀老人捻着胡須笑呵呵地說：“得了，咱一輩子沒白活，总算開眼了，能看到鐵牛耕地！”年輕小伙子更是着了迷，他們三人一伙，五人一團在一起談論。有的計算着一台拖拉機（當時農場用的是捷克小拖拉機）一晝夜能耕八十畝地，等于用十六個牲口十六個人耕一天；有的羨慕地說：“哪一天，要是咱們也能用機器耕地該多好！”

這時，困河黨支書白玉善用手指着一大片地对小伙子們說：“你們瞧，農場地是一斬齊，咱們的地呢？你們瞧那壩溝、地界和木樁子，象一把把刀，把这溜平完整的地割了个七零八碎。等多嚙咱們土地也連成片了，也開起集体化來，到那時，咱們也一准能用上拖拉機耕地。”如今，土地当真要連片了，要開集体化了，以后也能使上拖拉機了，这怎么不叫人兴奋呢！

但是，“組織起來，走集体化道路”对小农經濟說來，畢竟是一場伟大的革命。一時，人們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有拥护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打算。中农于洪紹在会上說：“沒有地可打不出粮食，入社也成，但有一桩，咱主张土地多算股，劳力少算股。”原来他家里地多劳力少。但是家里劳力多的戶就不同意，主张地股少分、劳力股多分。經過了好一陣子討論爭執，最后才議定合作社按土地四股、劳力六股分紅。

這場革命不仅表現在会內的各种爭論上，也深入到了

每个家庭。中农柴刚瀑家是个大家庭。柴刚瀑和三弟积极要求入社，哥俩一起去说服父亲柴宝光入社。老汉一听要劝他入社，就火了：“入社？入社有啥好处？咱家有二十九亩土地，又有劳力，咱想吃细粮有白面，想吃粗粮熬渣儿粥，这是咱自己挣的，要是入社都是人家的了。”柴刚瀑解释道：“入社，土地、劳力分红，社是社员伙的，社里多打了粮食，咱也能多分。”柴刚瀑好话说了三千六，老汉知道躲不过儿子，只好说道：“那咱先入去试试看。”可是入社不久，他就退出了，经过工作组和儿子们的反复动员，才二次入社。但是入社后，他让二儿子进城内私人工厂做工，自己留五亩地种棉花，并说：“社内如果一点粮食都分不到，连二儿子挣的带五亩棉花收的也够咱老两口吃的了。”村里一些富裕中农户，原先听说要办合作社，土地入股，牲口合槽，心头不安，后来听说“入社自愿”便甩开了闲腔。富裕中农赵连岐说：“咱不上那个套儿，还是车轱辘一转，香油白面儿好！”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酝酿和组织动员工作以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报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都拥到乡政府来看“稀罕”。会上首先报名的是白玉善，紧接着是贫下中农杨国强、赵佩伦，中农柴刚瀑、黎士清……一会儿报了十几户。

中农于洪绍一见有这么多人报名，凑到桌前问：“这入社自愿，退社可当真自由？”

白玉善耐心地对他讲：“共产党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决不说不实的话。可是有句话说到头里，退社得到秋后结算后，不

能半路脫鞋。若不，地里长滿青苗，咋个退法儿？”

于洪紹思謀了好一会儿，才說：“嗯，是这个道理儿。那咱报名干一年看看。”

中农张清德自己有騾有馬，怕入社以后减少收入，虽然工作组同志同他算了細帳，觉得自己不会吃亏，但临报名的时候，还是抱着“干一年試試看”的思想，慢騰騰地站起来說道：“給我也挂个名。”

小社宣告成立了，临开社員會議的时候，孙敬賢等几戶貧农又赶来入了社。但是几戶中农发生了动摇，沒等开会就反悔退出了。最后定下来十六戶。經南苑区委批准，正式命名为“团河村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六戶社員公推党支部书记白玉善和李敬林、黎土清、赵佩伦、柴剛瀑等五人，共同組成了社管理委员会。

社办公室設在张清德的小东屋里，正当中挂着毛主席象，两旁有一幅大紅对联，上面写着：“毛主席恩深似海，共产党德重如山。”就是这间社員們議事的小土屋，一时吸引了全村各阶层的注意，成了多数农民的希望。它象一顆閃閃发光的启明星，高高地升起来了！

### 十六戶 扛起办社旗 挖河泥 初次获胜利

小社成立后第一年，由于沒有經驗，农具不足，遇到了不少困难。在困难面前，党支部把社員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千方百計克服困难，决心把毛主席交給的这杆大旗打起

来。

牲口合了槽，沒有飼料。社干部們千方百計地克服各种困难，有的去借粮食，有的把自家喂牲口的粮食往社里背。他們就是这样带头克服困难，和社員們一起朝社会主义奔。

除了社內一些困难以外，村里一些富裕中农們，对合作社吹来了一股股的冷风：“穷光蛋打仗，都惦记捞誰一把，甬多久，准得吹！想富裕，这是作梦娶媳妇——空喜欢！”富裕中农赵連岐还編成顺口溜嚷嚷道：“驴駕轅，馬拉套，穷扛活的当家瞎胡鬧。別看他們这回折腾的欢，不到一年就准垮台！”

但是，小社并没有垮。在党的领导下，他們頂住了来自社內的困难和社外富裕中农的嘲諷。党組織指示他們，要把合作社办好，要显示合作社比单干和互助組优越，就得做出样板，把生产搞上去。

在社員会上，大伙心气儿很高，議論紛紛。他們說：要把办社这杆大旗扛起，打到底，就要增产粮食，增加社員收入。而要多打粮，就得多积肥。可是小社有四百三十多亩地，光靠掏厕所、換炕土鬧点肥怎么够呢？到哪里去找肥源呢？大伙正在发愁，柴刚瀑献計道：“我单干的时候，用河坡土垫洼地，庄稼长得格外壮。咱們这会去挖西大地凤河里几十年的老河泥，准能长好庄稼。”他的話提醒了大伙，小屋里騰起了一阵暢朗的欢笑：“对，让凤河为咱們服服务，挖河泥去！”

人們說干就干，决定第二天就动工。当时正是隆冬“三

九”，天寒地冻，不凑巧，天气又变了，北风刮得呼呼响。小社挖河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社外的贫农们称赞说：“十六户算是上了正道，来年收成准赖不了。”富裕中农赵速岐却撇着嘴笑道：“老天爷瞎眼，赶这时节刮起大风。小社挖河泥，这下子是瘫子打围——坐着喊吧！”地主、反革命分子于文泰和漏网地主赵英，碰到一起冷笑地说：“北风吹，雪花飘，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说完后，哈哈一阵狂笑。

地主们的仇视，富裕中农的嘲笑，怎么能阻拦得住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前进？十六户社员，冒着刺骨北风，天刚麻麻亮，就拿着洋镐、冰穿子、大锤、筐子，来到凤河。一伙人擦冰穿子，一伙人抡大锤，叮叮当当猛干起来。这一天冷得出奇。在大河冰面上，柴刚瀑想把冰穿子倒倒手，谁知手冻在冰穿子上了，几个人呵气才把手暖下来。社员们好容易把一尺多厚的冰层凿开了，乌黑的河泥，刚一挖出冰层，马上冻得梆硬。可是社员们却个个脱了棉袄，干得满头大汗。

河坡上，白玉善打头，挑起大架筐，一气地小跑，往河边上运河泥。突然，孙敬贤在冰床上脚下一滑，跌进了冰窟窿里。白玉善连忙上前一把将他拉上来，冻得他上牙打下牙得得直响。人们再三劝他回家换换衣服，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工地，说：“我十二岁那年要饭到永定门火车站，日本强盗硬说我是小偷，把我倒栽葱绑在杆子上，用鞭子抽打，然后剥个精光，扔在广场里，那也是‘三九’寒天，差一点冻死。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我的心比阳春三月还暖哩！”他说完，

推开人群，不顾裤子冻得梆硬，走路直掉冰碴，也不顾鞋子掉进河里，光着脚丫挑起大架筐，又干开了。

社員們包工定額每人每天挖兩方，可每個人都超過定額，挖了四五方。二十天后，在風河坡上，烏黑的河泥排出三四百米長，疊起三尺多高的小壩，共有九十多万斤，平均每畝地能上兩千多斤。南來北往、村里村外的人看着都說，“好傢伙，合作社真要翻個過兒啦！”“好個合作社，真是人多好干活！”但富裕中農趙連岐却說，“哪一輩子人用河泥上過地？豁出命也是白費勁。到頭來，哼，姜子牙賣面——賠本賺吆喝的事兒。”

轉眼間，冬去春來，已是一九五三年春天。社員們一冬一春的辛勤勞動，果然見了功效。小社里棉花、玉米、高粱的小苗樣樣都比單干戶、互助組長的壯實整齊，一片油綠。社員們見苗長得壯實，真打心眼兒里高興。對社一直有懷疑的柴寶光，這時也每天督促兒子們多出工，多掙工分，秋後多分糧。

### 遇澇災 中農鬧退社 奮起干 小社慶丰收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小社在前進的道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一年夏季一連下了三天三宿瓢潑大雨，在“蛤蟆撒泡尿都要澇”的海子里，哪里抵得住這麼大的雨。小社的棉花黃了，有些高粱、玉米倒了，眼看莊稼要全毀了。

在嚴重天災打擊下，有些人對“組織起來”的信心又動

搖了。柴剛瀑的父亲柴宝光一看社里受了灾，他半夜里把几个儿子叫起来训斥道：“要你们不入社，你们偏要入！这回涝了，我早算了，咱们连七十石粮的钱都分不了，可去年咱们家有百十石粮的收入。今年要是咱们自己个种，打多少都归咱自己个！”柴刚瀑对他父亲说：“爹，您老放心吧！咱们有党的领导，有政府帮助，等一打开天，咱们就抢救。”“抢救？能抢得过来吗？过去涝了，好的能收几粒，不好的是颗粒不收，现在你们就能了？”老头的火气更大了。

大雨刚过，第二天，社员王志宝就闖进社办公室说：“我要退社，家里头闹翻了锅，非逼我退社不可。”原来王志宝只是个人入社，这回涝了，他老婆就跟他吵起来：“不让你入社，你非入不行。现在涝了，你赶快去退社，我们自己抢救，还能打几粒粮食，不然社里十几户一分，粮就更少了。”这时又有两户闹退社。社员于洪源说：“我一个光棍，吃饱了全家不饿，如今累不少受，收成好不了，秋后我还能分到啥！尽给别人背锅，我不干！”中农社员于洪绍他爹，也闹到小社，要撤走作价入股的牲口槽，嚷着要退社。

这场风波，闹得白玉善等几个社干部有些心慌，不少社员心里也打扑腾。区委张书记知道了这事，及时指出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打一开始，就是一場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合作社建立之后，还必须经过许许多多斗争，才能巩固起来。在单干了几千年的农民中办合作社，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会老是风平浪静的。毛主席讲过：严重的問題是教育农民。富裕农民在春耕之前、秋收之后、遭灾之时

鬧退社，這是意料中的事。我們幹部必須要做好耐心的、生動的說服教育工作。”這一指示，給了白玉善他們以信心和力量。他們向鬧退社的社員進行了艱苦細致的說服工作，使社員們暫時定下心來。

雨過天晴，白玉善和工作組的同志搶先帶頭，和社員們一起扶直庄稼，鋤草滅荒，往地里追施化肥和棉籽餅。經過一場緊張的勞動，再加上原來的河泥底肥壯，沒幾天，庄稼又都挺胸抬頭，豎起直竄了。

這時，有些社員還是動搖不定，總感到入社不合算，吃了虧，打着秋后退社的譜。他們各自肚子里都有個“小九九”，柴寶光是七十石糧，黎士清是三十石糧，超過這個數就在社，不然就拉牲口退出來。當時，中農趙祥林想入社，黎士清私下里就對他說：“你先甬入。到秋后我要是退社，你就甬入，我要是不退，那時你再入也不遲。”這時黨支部考慮到，要教育群眾，首先就要解除群眾的懷疑，於是領着大伙逐塊地估了一次產量。經過計算，社里幹部告訴柴寶光說：“大爺，今年您分七十石棒子沒問題。”柴寶光自己合計了一下，差不多也能分六十多石棒子，但對分七十石還是半信半疑，就說：“到秋后再看吧，我看分不了七十石。”

秋天，小社獲得了團河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好收成。初冬，小社核定產量：玉米平均畝產一百九十五斤，最高畝產四百五十斤。比頭年成立小社前平均畝產一百二十斤，增產了百分之六十二。棉花平均畝產籽棉一百三十斤，比頭年成立小社前平均畝產八十斤，增產了百分之六十二。



而那个曾經說小社是“馱駕轅，馬拉套，窮扛活的当家瞎胡鬧”的富裕中农赵連岐，这一年虽然憋足了劲要和小社賽賽，結果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张飞卖豆腐——人硬貨軟”。他家的玉米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棉花平均亩产六十五斤，比社里的产量都低。

小社不仅搞好了农业生产，而且利用农闲季节組織熬硝等副业生产，增加了收入。秋天結算后，小社添置了一头大青驢子，两台嶄新的十寸步犁和其他一些生产資料。扣除还貸款、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外，每戶社員平均分紅五百七十元。单干时缺牲口少农具的孙敬賢，头年单干只收了两千多斤粮食，这次分了四千多斤，增加将近一倍。社員于洪源因为鬧退社出勤少，工分比人家少了一半，还分了三百多元，这时他才后悔了。柴剛瀑兄弟两人分的紅比单干时多收入四百一十九元。柴宝光老汉高兴地說：“沒想到，遇到了涝年头，社里还能分到这么多粮食和錢。沒說的，毛主席領的道就是对！”后来老汉把在城里做工的儿子叫回来，开了个家庭会，全家一起入社，不論男女一起到社里劳动，并規定，掙的工分男的可以留下百分之十，女的可以留下百分之二十，作为“体己”錢，以鼓励子女积极参加社里劳动。

小社用自己的丰收，打起了毛主席交給的这杆大旗，向团河村和附近一带广大农民群众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指出了单干农民要摆脱贫困，必須通过合作社，逐渐走向集体化。远近各村許多互助組都来參觀、訪問、要社章；許多干部前来“拜师”“取經”，連許多单干戶也通过在团河的亲

戚朋友，背地里探听合作社的底细，思谋着自己今后的去路。村里一些没入社的贫下中农户，见了社员就打听：“什么时候扩社？”“咱要入社，啥时候行？”

扩建社 疾风暴雨见劲松

假办社 风吹草动露真容

一九五三年十月，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年年底，这一带许多农业社，都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按照农民的意愿开始扩社了。

在团河小社办公室里，十六户老社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有的担心扩社后“龙多旱，人多乱”，弄不好惹是非、找麻烦；有的担心降低收入。有的说：“南苑土产公司一年卖给咱们一百多车肥料，咱要扩社，地多了，肥不多，还能增产吗？我看咱们干一年再说吧。”这时党支部书记白玉善开导大伙说：“咱有党的领导，人多力量大，人多是桩宝。肥少咱们可以积。再说咱们自个儿的日子好过了，还能眼睁睁地瞧着社外的穷哥们受穷吗？”一席话说通了大伙，通过扩社的辩论，提高了社员们的思想觉悟。不几天就吸收了三十几户入社，小社从十六户发展到五十四户，土地从四百三十亩扩大到一千六百亩。

总路线的宣传和扩社，不知打动了团河村多少人的心，独有富裕中农赵连岐一动不动。自打小社成立那天起，他就预言：“驴驾辕，马拉套，穷扛活的当家瞎胡闹”，不料，一九五三年大秋结算，他这个团河村响当当的富裕户，竟一头

栽在这帮穷扛活的跟前。他不服輸，下了狠心要爭口气，非要跟小社真刀真枪地見个高低不成！

于是，赵連岐挑选了张兆林、张治明等六戶中农、富裕中农，連他自己組成一个七戶的中农社。这七戶富裕戶劳动力强，有二百几十亩連成片的好地，八头牲口，四套車，就是仗着这些，要跟合作社比一比。但是赵連岐的社，实际上仍旧是变相的单干和換工，給誰家干活，記誰家的分。騾子馬頂两个工，驴頂一个工。村里党支部曾几次找赵連岐談心，动員他們加入合作社，而赵連岐却說：“是騾子是馬得拉出来溜溜，看那个社强，咱們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党支部一方面繼續对他耐心做工作，一方面也認識到在农村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教育和团結象赵連岐这样的富裕中农，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小社扩社后，新老社員們劲头很足，入冬起，社員們手脚就沒閑过。喂牲口，拉垫脚，检修犁、鏟、耙耨……，各种活茬安排得十分紧凑。一九五四年一开春，五十四戶社員就投入了春耕生产高潮中。由于社里土地多，耕了十来天，还有几百亩土地沒耕完。耕地进度落在赵連岐七戶中农社的后面。当赵連岐犁完最后一壟时，冲着合作社社員們譏諷地喊道：“喂，你們慢慢耕着吧，甭忙，到了芒种，怎么也耕完了。”社員們听了这些刺耳話，沒有立刻答腔。瞅着赵連岐走远了，柴刚瀑沉不住气了，說：“我不信咱們就叫他看扁了，‘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咱們无論怎样得加把劲赶上

去！”“对，咱们打夜战也赶上去！”社员们意见完全一致，于是大伙起早恋晚，每天夜里挑灯夜战干半宿。这样突击了七八天，很快把地耕完种上了。

经过一冬一春的辛勤劳动，社里的高粱、棒子长得茁壮碧绿一码齐。农民走过社里地头，都议论说：“这下子赵连岐又输定了！”

谁料，六月底，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这是几十年来所没见过的大雨。出了村放眼一看，只见平地上茫茫一片大水，连村西山坡上百年老松树的大根子，都被冲了出来。面对这样的大涝灾，合作社经历了一场新的考验和新的斗争。一些田地地势较高的社员，觉得入社吃了亏，嚷着要退社散伙。社外一些富裕中农也在一旁讥笑说：“一冬一春白忙活了，这回合作社该现眼了吧。”

在这茫茫大水面前，在这内部有些社员办社信心动摇，外部富裕中农讥讽嘲笑的时刻，党支部召集社员们开了个紧急会议。支部书记白玉善说：“大伙儿放心，咱们有党、有政府、有合作社，可不比单干时节，孤苦伶仃的，只要咱们心齐，大伙拧成一股绳，天塌下来，咱们擎得住。若是咱们叫老天爷吓住，这一年心血，一年劳碌才叫玩完呢。”杨国强接着说：“自古以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不能散伙，只有紧紧抱在一块，才能抗灾。”

党支部一方面做思想工作，鼓励社员的抗灾信心，一方面去区委汇报请示。白玉善汇报回来时，对全体社员讲了区委书记的指示：“咱们别怕。过去咱们不管是谁，碰上了

天灾人祸就得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咱们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就一定能从龙口里夺回粮食来！”大伙听了，多数人有了抗灾自救的信心，说：“听党的话没错，眼下这八九天大雨，下得沟满壕平，风河水也浸过了河床，打明儿起，咱们得下地挡水去。”

这时突然屋外喊道：“风河决口啦！上河保堤啊！”经过党支部一阵简短的部署，社员们便各自跑回家里，有的拿出木板、麻包、秫秸，有的拿出铁锹、斧子、大锤，一齐奔往风河。

果然洪水把堤坡冲开一丈多宽豁口子，堤的另一边涌起半人多深的水。白玉善赶紧领人扛麻包，压秫秸。可是水势太大，水流太急，大水一掀，都卷下去了。于是白玉善又和几个大汉跳下河去，用树橛子打桩，可是还未等桩子砸稳，连人带桩又被一齐冲走了，口子豁得更大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民解放军的大队人马开来了，立刻投入了抢险战斗。这时白玉善激动地大声喊道：“乡亲们，保卫咱们的劳动果实，下河挡水啊！”白玉善和解放军官兵首先跳进豁口，用身体阻挡洪水的去路。接着社员杨国强、柴刚瀑、黎士清、孙敬贤、赵佩伦等也跟着一齐跳进混黄的泥水里。于是三、四十个人手挽手肩并肩，结结实实筑成一道人墙。就是这道用人们的意志和力量筑成的铜墙铁壁，挡住了汹涌的波涛，使人们能够在人墙的里面，砸桩子、压麻包……终于把决口堵住了。

二十多天阴雨以后，天才开始放晴。几尺深的水逐渐



楊永青 圖

排下去了，庄稼露出来了，有的连根拔倒，有的东倒西歪。没过几天，地里野草窜的比禾苗还高。这时，大田抢荒、棉花整枝和施追肥等活茬全挤在一起了。

单干户在这种时候是没有什么办法好想的。单干户张德福有一块洼地，干瞪眼瞅着草在地里长，棉花一天一天枯黄下去。一个人顾了抢荒顾不上整枝和追肥，一遍荒还没抢完，先抢的地又长起了草。眼看地里庄稼没指望了，只好走过去单干农民走过的“好年头，搞生产；赖年头，刮地皮”的老路，单等到秋天刮起西北风，地皮上泛出霜白硝的时候，扫硝土熬硝度日了。互助组这时也解决不了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只好自顾自了。赵连岐那七户社，见庄稼没指望，心儿早已涣散啦。赵连岐愁眉苦脸地说：“天不作美，眼下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也甭说谁对不住谁，咱们各顾各吧。”

而团河合作社，这时一方面组织社员放牧区政府拨给的一批牛羊，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向龙口夺粮，凡是能下地的劳力，都动员起来了，组成拔草、整枝、追肥三个突击组。地里涝，稀泥直陷脚，不能用大锄，大伙就想法，用月牙似的小韭镰一点一点地锄。大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把庄稼赶快抢出来，秋后多打粮食要紧。”真是人多好干活，大伙劲头足，出勤率高，一天抢三四十亩，一连抢出了五百多亩荒地，还施了七百亩地的肥。每当社员们成群结队高高兴兴地打地里回来，那些不能下地干活的单干户，就羡慕地说：“还是合作社好！”

人多力量大，大伙的活大伙干，眼看荒就抢完了。”

地里的庄稼，经过抢荒、追肥，没有多久就又茁壮地生长了。这一年，虽然遇上了大涝，但是由于社员们的齐心协力，年底结算时，合作社平均每户还分了三百来元钱。

白玉善等社干部，看到社员高高兴兴地分到粮食和钱，满心激动。白玉善想起两年前在区委会说的一句话：“毛主席交给咱的旗，咱拼死也打到底！”他们打起的这杆大旗，象一颗闪闪发光的金星，给团河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指出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农民群众看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真是“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还没到秋收，就有一百多户农民要入社。因此，在一九五五年春，除了十二户地主富农以外，全村一百六十二户贫农、下中农、中农志愿组成了“团河农业生产合作社”。

小井大 步步上升

金星社 水到渠成

一九五四年，在涝灾的考验面前，这一带各个庄子的小社，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使农民群众具体地了解到，要向自然开战，搞生产斗争，现在的一二十户小社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于是，从一九五四年秋到一九五五年春，农民们自动自愿地把几个庄子的小社并成一个大社。

不过，革命的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会遇到保守势力的阻碍，有时还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当时，志远庄菜田比较多，



收益比較大。因此社員刘成俊嘀咕着說：“咱們有菜园子，种菜收入多，并了社，他們还不是吃咱們的呀！”这时，反革命分子郑瀛州也趁火打劫，暗地煽动說：“志远庄地好，园田多，是一块肥肉，四周的狼都要吃，并了社，那我們不白干了？”这話传揚出去，惹起周围庄里的人老大不滿。西毓順有的社員說：“你們志远庄有啥了不起，几亩园子有什么稀罕！你們用八抬大轎抬我們并社，我們還不去呢。”大生庄有的社員也說：“鸡多不下蛋，人多瞎嚷嚷。人家富足，咱們可不去受那分窩囊气。”而广大的貧农、下中农却是坚决要求并社的。党支部領導他們揭露了階級敌人的陰謀，并对社員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算了細帳，讲清并社后仍然是按劳分配，土地分紅，誰也不占誰的便宜，使社員們統一了認識。

这一年，除了前面提到的团河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志远庄、建新庄、大生庄、西毓順等四个庄三个小社合并为“志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老三畚、新三畚、寿保庄、大白楼、北同順、南同順几个小社合并为“南同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社仍是按自願互利原則，以土地入股分紅、統一經營为特点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小社合并为大社以后，經營規模扩大了，遇上这年是风調雨順，沒有遭到多大灾害，一九五五年秋获得了大丰收。

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丰收的喜悦，並沒有迷住人們的眼睛，冲昏头脑，党要領導翻身农民繼續前进。

这里过去一向是“大雨涝死，小雨碱死，不下雨旱死”，人们要想在经济上翻身，还必须解决排水、灌溉问题。这里的人们清楚地记得，志远庄和建新庄为了水还闹过一场纠纷。那是一九五〇年夏天，几天连阴大雨，地里一片汪洋。建新庄为了不让北面志远庄的水南流到自己地里，在两庄交界处筑起了一道小堤坝。志远庄要求建新庄决堤泄洪，建新庄坚决不干，贫农霍胜才等人回答说：“要决也行，得有个条件：你们要包下我们庄一年的生活。”志远庄的人们眼看地里的水越积越深，庄稼全要被毁了，情势紧迫，就说：“让决也得决，不让决也得决！”于是全庄五十多人扛起铁镐、二齿，拥到建新庄小堤坝。这时，建新庄的人也拿着农具、木棍出来保卫小堤。贫农高士和躺在堤上，高声叫道：“咱今年六十多岁啦，看谁敢动一动！”有的喊：“咱们豁出来，就是用铁镐拼死几个也不让决堤。”两庄的人登时乱成一团，有的喊打，有的叫骂。就这样，两个庄子翻了身的个体农民，因为抵抗不了自然灾害，不得不手持农具、木棍对峙起来。后来经过区政府和乡政府的说服和调解，两庄代表在一起协商决定，在堤上安装两个小水管，让志远庄慢慢排涝，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解放以来，为了排水，政府帮助农民挖过凤河也修过渠道，但是，这种临时措施，不能改变这个地区面貌。这种办法对小雨还能勉强起作用，可连阴大雨就不行了。要想挖掉穷根，只有走南同顺国营农场开稻田的道路。开了稻田才能改造低洼盐碱，战胜涝灾。当时南同顺国营农场开种

的水稻，每亩收八百多斤。一九五四年虽然大涝，农场的稻子仍然获得了丰收，社员们非常羡慕。可是开稻田，小白楼的经验证明，力量小了不行，百十户的社，没有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土地是私有的，在谁家的地开渠、打井，谁也不愿意。于是人们想：既然一个村子和几个村子能组成大社，如果把这个大社再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社，力量不就更大了吗？这是摆脱了个体经济的束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要战胜灾害，摆脱贫困，走向集体富裕的迫切要求和大胆设想。

正在人们这样渴望、设想的时候，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部光辉的著作，适时地给农民送来了指路明灯。这年秋天，这一带的农民和全国的农民兄弟一起，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团河乡、志远庄乡、南同顺乡、南小街乡等，四乡五社合并成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命名为“金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此，金星社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又向社会主义跨进了一步。

**破旧俗 妇女们走上工地  
建头功 突击队大显身手**

一九五五年，金星农业社成立后的第一个秋天，社员们就展开了向大自然要粮的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挖河打井，准备开稻田。

当时全社一万六千亩上地，有一万三千亩是涝洼碱地，

差不多每年都积涝成灾。为了改造这些低产田，金星乡党委发动大家讨论后决定：在治水排涝的同时，改旱田为水田，实行蓄水与排水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开凿团河东大河和西大河，并在河上打井，把团河东大地和西大地一千五百亩低洼地改为稻田。党委向全体社员提出了“拔穷根，扎富根，变旱地为水田”的响亮口号；并成立了河工指挥部，由苏树业任总指挥，董志隆等八人，分管财务、采购、宣传和四个责任区。

阴历十月一日，五百多劳动大军齐聚在团河村，开始了修建团河长八百多米、宽二十多米、加深二米九的东大河和西大河，以及在河上每隔二十公尺打一眼竹管井的工程。这时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寒风吹得人们伸不出手，但是社员们不怕苦不怕累照样干得欢。工地上敲打冻地的响声和劳动号子声，交相呼应，震撼了整个沉睡着的土地。

在工地上，青年们尤其活跃。团河村的一支青年突击队，高举着大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由队长魏兴、于文尧以及队员黎延会、孙敬贤、杨国强等膀粗腰圆的棒小伙子打头，紧跟着是李荣贞、杨国琴等一帮姑娘，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了工地。这伙年轻人——特别是突击队的姑娘们，引起了人们种种议论。志远庄的一位老大爷又称赞又惊讶地说：“真是出新鲜事儿，团河那么讲礼道的村子，连妇女家也出来挖河打井了，真不易呀！”

~~原来~~团河村大多是满族人，在旧社会很重视封建礼~~节~~，儿媳早晨起来得跪着给婆婆请安，等等。这些

封建礼儿，虽然解放后随着封建势力的被推翻，婚姻法的公布和妇女的解放，逐渐没人讲究了；但是一些古旧习惯、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歧视，在一些人的心目里还残存着。打井时，妇女们莫说不能上井架，甚至连看也不让看一眼，说看了之后，井锥就要掉到井底下，井就打不成了。盖房上梁，妇女也不能看，看了梁就上不正，因此，上梁要深更半夜，等妇女都睡了才动工。这次青年妇女们竟然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参加了改变家乡面貌的战斗，这不仅为生产斗争增添了新生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向旧的习惯势力的一次有力的冲击。

团河青年队的红旗插在工地上，也插在三十多个小伙子和姑娘们心上。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是英雄，是好汉，挖河打井比比看！”他们每人都立志争取做一个“战胜干旱、改造自然、敢想敢干”的英雄好汉。

他们包下了突击挖掘路口土方的任务。路口常年被车轧人踩，土质坚实，加上当时冰封地冻，更是坚硬，镐头一下去就蹦开了，震得虎口生疼，可是地皮上只留一道白印，照样纹丝不动。怎么办？困难是吓不倒硬汉子的。经过一番研究和试验，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首先集中力量凿开一处，然后用掏挖的方法，避开冻土层，按照施工设计路线，从三尺地面下挖开去，挖成一道小“隧道”。这样干，进度比较快。“隧道”挖成以后，用大榔头一块一块地往下锤打，一条河道就初具规模了。大伙干劲十足，有的一次挑两副担子四大筐土，没有工具的就用双手抱运大块大块冻土。尽

管天寒地冻，大伙脱掉棉衣棉裤，还是浑身冒汗。人们一致赞道：“这帮小伙子大丫头们真叫棒！这样冷的天气，他们一点也不怕冷，好象他们全身就是个火炉子！”当时每人每天计划完成六方土的任务，而青年队的小伙子、姑娘们，个个都超额了。队员张清帝一天竟挖了十二方，创造了最高记录。

战胜了一关，又来了一关。挖着挖着，地下水出来了。而且由于突击队挖的深、进度快，其它工段的水都往他们工段流。工段积水了，队员们没有胶靴就光着脚干，腿上被冰碴划破一道道的血口子也毫不在意，照样猛干。装卸的工具不够用，挖出来的冻土块，有的就用肩扛背驮。

这样艰苦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叫苦，大伙只有一个想法：“要挖掉穷根，扎下富根。青年队要走在前面，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当时的情况是，哪个队进度快，挖的深，哪个队的困难就最大，因为水往低处流。队员们为了把方便让给别人，宁愿自己担起困难的担子，每天都是早上班，晚下班，不歇晌，挤时间多干、快干，把水引向自己的工段，给别的工段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大伙一起多干，并肩前进。青年突击队工段上的抽水机昼夜不停地轰轰隆隆地响着，伴着喇叭声、人们的歌声、笑声，整个工地上热气腾腾，一派欢快景象。青年队的崇高风格尤其激动人心，工地上顿时掀起你追我赶的交手赛，工程迅速地进展着。

辟謠言 敌人阴谋破产  
鼓干劲 打井提前竣工

在坚持生产斗争的同时，社員們又进行了两条道路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当人們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出来泼冷水了；一些不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也暗地煽动破坏，妄图阻止社員們前进。

有些人对开稻田走集体富裕的道路不凭信。团河富裕中农柴刚俊說：“要挖穷根、扎富根、吃大米，我看这叫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的說：“說早的，济德堂的江朝宗开稻田栽了跟头；說近的，一九五一年同小白楼开稻田同时，团河的刘继增、张清德他們十八九戶也开过二百亩稻田，結果喝了湯不要紧，每家还欠了一屁股的債。咱們这鬼地方开稻田，哼，門儿也沒有啊！”在計劃开的稻田中，包括有小白楼貧农张泽君家的十亩地。张泽君的父亲跑到大街上，嚷嚷道：“这不是明摆着瞎胡鬧嗎？我家那十亩地，誰見长过庄稼，这回一帮黄毛丫头、小子就有能耐叫长出稻子来？”还有些人怕費力不討好，开不出稻田背一身債，說：“刘继增他們欠的一千多元債到現在還沒还清，咱們要是欠下債怎么办？”

这时候，地主分子柴振国、戴云亭、段发科等，也趁机蠢动起来。他們背地煽动說：“这么冷的天气，去干活！过去的牛馬冬天还得点閑哪！苏树业（当时的乡长）他們坐在办公室一张嘴，咱們可就活受罪了。”多数貧农、下中农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气愤，馬上反駁說：“閉上你的臭嘴吧，过去

冬天不干活的只有你們地主，誰說苏乡长他們淨坐办公室，你眼睛看不見他們整天忙活嗎？”

階級敵人不死心，見一計不成，遂生二計。一天吃中午飯的時候，地主柴振國見小白樓貧農張二小因為什麼事心裡不高興，就湊上前去，扮着笑臉說：“唉，老是白天黑夜地干，連歇歇的工夫都沒有。我看你就歇個工，進城去听個戲什麼的，玩玩去。要是不准假，你就說有病得去瞧瞧。”地主戴云亭，拉攏當時責任區主任魏成俊（後查明是壞分子），經常拉他到家里以好茶好烟相待，並乘機破壞說：“主任，稻田能不能開，小白樓是面鏡子，要是賠進幾百塊，你這主任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啦！”

階級敵人的破壞，富裕中農的潑冷水，一時攪得工地邪氣上升，加上當時勞動環境的確艱苦，領導上抓生產多，關心社員生活不夠。挖河的人，一度會由五百人減少到三百人左右。鄉黨委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分析了原因，分別召開了幹部會和社員大會。在社員大會上，黨委胡書記向大家講道：“咱們是只顧眼前不挨凍不吃苦，還象過去一樣，老天爺下大雨澇死，下小雨鹹死，不下雨旱死，忙活一年打不了幾粒糧食呢，還是寧肯目前吃些苦，受些累，徹底挖掉窮根，象南同順農場那樣開稻田，一畝地打它六七百斤糧食，走集體富裕的道路？”黨委書記的話引起底下一陣議論：“胡書記說得對，不吃苦怎麼能得甜？”“開稻田，走大伙富足的道路，本來就是正理嘛！”胡書記繼續說：“對！那咱們要有決心，堅決地挖掉窮根，決不能半途而廢。”緊接着鄉長兼河工



总指挥苏树业代表干部对大伙说：“我们干部的工作有缺点，今后一定改，过去对大伙的生活关心得不够，今后我们要狠狠地抓；工分订得不够合理，有的偏低些，我们也研究改进。但是咱们千万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听信了敌人的挑拨。”接着他着重讲了地主阶级为什么不甘心人民过好生活，总是要想方设法拆社会主义的台，号召大伙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制止敌人的破坏。

会议之后，人们心里豁亮了，各责任区又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开会斗争了地主分子柴振国、戴云亭、段发科，揭露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使人们认清了地主的反动本质。贫农张二小指着柴振国的鼻子质问说：“我没有病，你要我装病不上工，你说你安的什么心！”一些中途歇工的社员说：“咱们上了地主的当啦。地主见咱们走集体富裕道路就心怀仇恨，希望咱们穷一辈子，可咱们偏要争这口气，非坚决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不可！”

经过教育，团结了中农；经过斗争，打退了地主阶级的进攻。顿时工地上出勤率大增，由原来五百人增到了七百人仅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提前八天完成了团河东大河和西大河的工程。人们奋战一个冬春，挖掉六万土方，挖成了三条水渠，长达一千九百米。

在挖河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打井工程紧接着上马。三百五十人开了二十盘架子。技术工人全是由外地请来的。党团组织为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号召青年人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技术，每盘井架上都配备了青年突击队员，

請工人老大哥带徒弟。师傅教得好，徒弟也学得好。队员们为了尽快掌握技术，白天黑夜不离井架，勤学苦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学会了打井技术。他们在老师傅的帮助下，自己开了两盘井架，试着独立操作，并且学着带徒弟。这时，那些不甘落在男社员后面的妇女们，不顾别人讥讽、歧视，也勇敢地投入了这个行列。开始男社员们有些瞧不起她们，说：“女的干点粗活还凑合，打井这技术活，能干得了吗？”事实是最好的见证，妇女不仅能干，而且干得好，学得快。李荣珍、徐润华、李秀荣等很快地掌握了打井技术。这样，也带动了其他的队。他们说：“咱们井架上也来个女的吧。”后来男劳力主要干挖河等重体力活，在打井架上，妇女劳力顶了大半个天。

在打井中，团河青年队的男女队员们，始终是“干”字当头，他们起早摸黑，巧干苦干。别人歇晌他们不歇，别人回家吃饭，他们在工地倒换班吃，歇人不歇机，所以打井进度也一直遥遥领先。由于青年队在挖河、打井中成绩显著，市人民委员会授给他们“青年先进队”的光荣称号，奖给他们办公桌、闹钟等奖品。共青团南苑区委奖给他们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奖给北京市南苑区金星乡团河兴修水利青年突击队，战胜干旱，改造自然，敢想敢干，又红又专”等几个大金字。

快到旧历年了，突然从八号井架上又传出了一些谣言：“共产党、八路军嘴甜心辣。天气这么冷还要打井，拔啥穷根、种啥水稻，光说得漂亮，大米都让谁吃了？还不是让城里

人吃啦，咱們連米湯也喝不到呀！”这些恶毒煽动，使个别落后社員也嘀咕开了：“可不是嗎，咱以前哪吃过白米飯呀？現在咱又挖河、又打井的，咱是为誰忙活呀？”有的說：“社会主义好是好，可咱眼前瞅不見呀！”这样，影响了一些社員的劳动热情。金星乡党委发现以后，一查，又是地主分子柴振国造的謠。馬上召集社員們开会，揭穿了柴振国的阴谋詭計。会上人們用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人民办的 大量好事，来駁斥地主的无耻謠言。貧农李金才說：“地涝了，国家給救济；生产上有困难，国家貸款、貸种，使我們有了吃有了穿。可解放前誰管我們的死活？吃好的那是你們这些狗地主。”有的斥責柴振国說：“你恨共产党，恨社会主义，也挑拨我們恨，这是梦想！告訴你，共产党比我們的亲娘还亲，社会主义是我們的阳关道。你放老实些，不許乱說乱动！”

群众的說理斗争，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气焰，也教育了自己，干劲鼓得更足了。井架上开展了紅旗竞赛，改进了打井技术，进度很快，原来打一眼井需要二十五天，現在只需要七天就成了。結果以二十五天時間完成了四十眼井的任务。这一年金星农业社一共开凿竹管井九十七眼。

敌人的破坏，阻挡不了組織起来的人們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和信心。社員們又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新的战斗。

开稻田 人小志大心底紅  
扎窩根 勤學苦鑽練硬功

人們剛剛用緊張的勞動送走了嚴冬，一九五六年春天來到了。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社員們在興修水利、改注治水以後，緊接着是變旱地為水田。

金星農業社除了原來跟南同順國營農場交換過來的九百五十畝稻田外，決定在團河東大地和西大地開稻田一千五百畝。種稻子，社員們真是又喜又驚。他們早就盼望開稻地，可惜人少力單，無能為力。現在組織起來了，人多勢眾，能夠開稻地徹底改造低洼鹽鹼、擺脫貧困了，誰能不高興呢！

但是，當時大伙全都不會伺弄稻田的活茬，想起一九五一年“開稻田委員會”的失敗，又怕這次搞不成功。有的社員嘟嚕着說：“開這樣多的地，要是砸了，全玩完了。”的確，不懂種稻技術，一下子就種這樣大面積的水稻，是一個大膽的試驗，也是一場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克服自然的、人為的、技術的種種困難的戰鬥。

對於新鮮事物，青年人最容易接受，雖然他們沒有經驗，但是信心大、干劲足。種水稻打先鋒的任務，又叫青年人承擔下來了。鄉黨委和社管理委員會為了管好稻田，除了團河青年隊外，又決定成立南同順青年生產隊。這個隊包括南同順、壽保莊、老三畝、小白樓、大白樓、居民區等地青年。當共青團委號召成立青年隊時，青年們都踴躍報名。

老三畝庄的梁吉香，当时才十五岁，个头小，体力弱，团委不批准她参加。她哭着說：“別嫌我小，我还能老小嗎？干活比不过人家，我不歇着还不行嗎？手脚老不停地下还不行嗎？”团委只好批准了。

但是青年們这种积极行动，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碍，不少老年人反对說：“你們这帮青年人，还干得了这个？”也有人說：“小伙子和大閨女湊在一起成什么体統？”女青年唐淑荣的媽媽听了这話，也阻拦她的女儿說：“閨女，咱不听他們那些胡話，咱不去！”但是，青年們沒有理会这些，他們突破了阻碍，向自己家的老人做了許多思想工作，使大部分家长想通了。結果有三十六个青年参加了青年队。

青年队承受了养稻芽子的任务。这是大胆試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青年們說：“芽子是命根子，咱不看好就打不了粮食。”稻子收成的好坏，首先决定于芽子养育的好坏。青年們决心把芽子养好。他們提出保証說：“虛心学习，绝对听从技术員的指导，无论是风雨天还是好天，一定坚守芽子地。”于是，青年們住在芽子地，吃在芽子地，一起学技术，一起劳动。許多青年整天跟在技术員身后，不懂就請教，苦学技术。

养芽子是桩技术性很强的活茬，从打池子到每亩地撒多少籽，从下种到育秧，从管理到拔秧，都需要青年們苦学、深钻才能掌握。当时养芽子也是桩苦活茬。早春，地还没完全解冻，拉水、搗池子，都得光脚丫下田。脚踩着冰碴，春风一刮，腿上都裂成小蚱蜢口，往外流血。但青年們并没有

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們照样脫鞋下田，蹚着冰碴干。牲口拉碾子平稻田，拔不出腿来，他們就干脆卸了牲口，人力代畜力，十个人拉一盘大杠，两脚陷进泥里老深，艰难吃力地拉着。

金色的稻种撒下之后，青年們真跟母亲照看婴儿那样細心，白天黑夜輪班看护，連吃飯也蹲在池子边看芽子。有的小伙子不該他輪班，夜里睡着睡着突然爬起来就往外跑。出屋看看天气，看看芽子，測測地溫水情以后，才放下心，回屋睡觉。

一畦畦嫩綠鵝黃的幼芽，果然沒有辜負青年人的心血，茁壯地出水了。这是大胆試驗的第一个胜利。芽秧育出的消息传出之后，老大爷、老大娘、大姑娘、小媳妇和孩子們，都跑来看稀罕。他們紛紛称赞：“这芽子长得真壮，还是这帮青年人行！”人們高兴地看到，一棵棵稻芽子在溫暖的春风中、阳光下茁壯地成长；而这一个个年輕人，也在“挖穷根，扎富根”向大自然要粮的战斗中，健康地成长起来了。他們之中許多人掌握了全套养芽子的技术，成了技术能手。

六月，拔了芽子，开始插秧。誰会插呢？全团河只有楊培英老太太（南方人）一个人会插。人們看着她插，感到新鮮輕巧；可是自己伸手一插，累得腰酸背疼不說，还弄得七歪八斜的，橫豎不成行。没办法，只好每亩地花費四元五角代价，从德州、涿县一带請人来插。青年們見到社里要額外开支这样大一笔錢，心里很痛惜，很想自己試一試。可是有的人也犯嘀咕：“这要弄不好，咋见人？”多数人却說：“咱

們是突击队，打先鋒就得闖！天下的路都是人闖出來的。咱們包下几百亩地來，不會就學嘛！”說干就干，青年們包下了三百亩稻田。緊接着掀起了學習插秧技術的高潮。

開始時，他們緊跟在技術工的後面，兩眼死盯着他們的手，苦學硬功夫。只看人家插得直，棵距行距一定；而自己一插不是株距短了，就是行距寬了，不成壟也不成行。這時青年隊副隊長王玉春就和大伙一起想辦法拉綫找直，用竹杆標距離；“甩六退四”的技術掌握不好，大伙就一邊插一邊量尺寸。青年們彎腰苦干一天，收工後，腰杆酸痛得直不起來，腳板泡得發脹，手指頭也腫了，渾身不得勁。但千難萬難，也改變不了他們“拔窮根”的決心。為了儘快掌握插秧技術，完成插秧任務，王玉春、梁吉香等一伙人，下工以後，仍然用土塊和稗子在場邊上摸着黑練習。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很短時間內，青年們終於掌握了插秧技術。一般社員一天插三四分地，而青年隊每天插八九分地，提前完成了三百亩插秧任務。青年們學得這麼快這麼好，連當時請來的工人們都很吃驚。他們說：到底是靠毛主席近的地方，人杰地靈，就是聰明，這幫姑娘、小子剛學不久就象一個老手了。

克服了一個困難，又產生了新的困難。青年們在困難面前，始終是鬥志昂揚。插完了秧，接着是撈秧，大伙也是邊學邊干，有時大雨傾盆，他們也照樣堅持不收工。撈完三遍秧後，有的人手指甲都磨禿一層，手指頭也磨破了，大伙還是堅持干。女青年楊國琴手指頭破了之後，感染化膿，要她回去休息，她說：“這活干不了，我可以去旱地里干活！”

始終不肯休息。

人們的汗水沒有白流，這一年稻田長勢普遍很好，田野一片蔥綠，逗人喜愛。

### 遭災害 夙河邊上起風波 慶丰收 貧下中農志不磨

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這年夏天，一進雨季，瓢潑大雨就下個不停。金星農業社成立第一年就遭了大水災，災情比一九五四年還嚴重。當時，社里還沒有收入，資金比較少，一些新入社的貧農、下中農家里吃的、燒的都碰到了困難，其中有的人對農業社又發生了動搖；有的富裕中農本來入社時就三心二意，抱着雙腳踏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船的態度，打算先入社看一看再說，現在見社里地澇了，他們生活並不困難，也想趁機要救濟、要貸款，從中撈一把。中農宋友庭抓著蘇樹業的脖領子嚷道：“不給吃的，老子今天要揍活人！”老蘇掰開他的手，嚴肅地回答說：“揍人我不怕。誰家當真沒有吃的，鄉政府一定會救濟。可是你問問庄里，誰不知道你們家里有吃的！”宋友庭見干部們知道他家的底細，自知理虧只好走掉了。過了幾天，小白樓中農張大傻子，又借著喝酒的緣由，耍起酒瘋來。他拿著把切菜刀，氣勢汹汹地闖進農業社辦公室，找到社里管財務的副主任衡順義，高聲叫道：“衡主任，我家揭不開鍋了，你得借給我錢，不然，今天就是你和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衡順義見他裝瘋行凶，大聲喝道：“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幾個干部



上前把菜刀夺下，让他坐下，耐心开导他，問他道：“你沒有錢吃飯，怎么有錢天天喝酒？老街旧邻的，不要裝瘋賣傻，誰也知道誰！”张大傻子碰了一个軟釘子，只好低着头回家了。

在部分中农鬧事的时候，地主分子也伺机蠢动起来。八月中秋节快到了。地主楊宝真私下里故意对一些中农社員唉声叹气地說：“哎，天气眼看要冷了，該做棉衣啦，現在不做，什么时候做呀？”一些中农也答腔說：“八月节到了，过去单干吃月餅，今年怎么办？”这时候，要同农业社較量的中农单干戶张成和胡振宇，到处打草卖錢，也对社員們夸耀說：“看咱单干够多自由！不管咋的，总比你們强。”一些社員被这股歪风，吹得是非莫辨，也打起草来，全社的劳动出勤率曾經一度下降。

面临这些問題，絕大多數的干部和貧农、下中农的态度是坚定的。地主柴振国对貧农李长江說：“小棒子(李的小名)，你还到队上干活？我看你秋后要不喝西北风才怪！”李长江坚决回答他說：“你放心吧，不要猫哭老鼠假发慈悲了！我就是耍干，为集体干，也为自己干，在社里干，我是认准了。告訴你，你要放老实些！”但也有些队干部和社員沉不住气了，找党委書記、社主任，問道：“咱們咋办？”社干部們回答道：“咱們社要办，节要过，棉衣要做，飯要吃。社要越办越好，日子也要越过越紅火。咱們一定想办法解决困难。”經過研究，党委会决定，先从供銷社預支出一笔棉花和粮食預购款，一部分用来搞生产，抗灾自救，一部分用来解决困

难戶的生活。社干部們分別下到各队去摸底，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困难戶解决了困难，提高了大家办社的信心，頂住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势力袭击，打退了階級敌人的进攻，这场风波平靜下去了。

从此，出勤率高了，人們齐心排水抗涝，日夜精心管理稻田。社員們一年劳动的心血终于換得了丰硕的果实。这一年稻子长得十分好，沉甸甸的稻穗遍地一片金黄。在丰收面前，人們原来的怀疑顾虑都破除了。春天罵大街說开稻田是“瞎胡鬧”的张泽君的父亲，見他家十亩地稻子长得有半人多高，估产每亩达七百斤，老汉双手捧起籽粒饱满的金黄色稻粒，感叹地說：“这回我算服輸了。”这时站在一旁的貧农社員曾淑英对他說：“老人家，这就是合作社的优越性！”老汉又羞愧又高兴地說：“对，对，敢情組織起来就是力量大。”

金星农业社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五十斤，而青年突击队的三百亩水稻試驗田，平均亩产竟高达七百二十斤。这是海子里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的大丰收。当雪白的大米挨戶送到每个社員家里的时候，人們的心情真象土改那陣分到土地一样高兴。大人們刚从地里回来，孩子們老远就迎了上去，大声叫嚷道：“爸爸，咱們今儿吃大米飯啦！又白，又軟，又香，可好吃啦！”孩子們高兴得欢蹦乱跳；上了年紀的人又何尝不激动呢？双手端起雪白的大米飯，想想过去給地主扛活种地年月，吃的是糠窝头、野菜、豆餅，过年过节最好也只能吃上頓玉米窝窝头。大米白面那是地主老爷吃的

呀！可今天，党领导他们组织起来，又亲手种上了稻子，在重灾之后，竟然吃上了雪白晶莹的大米，怎么不打心眼儿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呢？社员们兴奋地說：“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咱们指的路，咱们跟着他老人家走对了啊！”

这一年，全社的旱地，由于推行了宽壟密植和良种試驗，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平均每亩仍然产了二百三十一斤，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产了百分之四十六。

不过，生活的海洋永远是不平静的。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討論秋收分配方案时，又发生了問題。党委会提交社员們討論的分配方案是：扣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外，在保証社员們的收入略高于上年收入的情况下，归还国家一部分貸款，这样公私兼顧，既有利国家又有利社员。但有的干部和社员却主张，“有多少分多少”，“該多分就多分”。意思是說除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外，全部分給社员。

正当社员議論紛紛的时候，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又显露出来了，又借机起来鼓动退社了。他們說：“錢是我們的血汗掙来的，为什么不全分給我們？”团河富裕中农柴剛俊見了人就眉飞色舞地宣揚說：“哎，还是‘大車一轉，香油白面儿’靠得住，在社里分它三块、五块的，耗子尾巴——沒有多大油水！”在部分富裕中农的影响下，志远庄中农刘成俊跑到社里牲口棚要拉牲口，并且嚷嚷說：“干脆单干吧，在社里打多少粮食也挡不住要飯。”

烈火之中見真金，考驗面前識真心。大多数的貧农、下中农的反应却大不相同。貧农王善宗說：“現在不挨餓了，

又有錢花，誰說不好？我去問問他，他安的什麼心。過去要是遇到這樣的災還不苦了？”新建庄貧農呂家燕、高振國等人的母親，在一起議論說：“叫咱說，黨委書記說的道道對，想想過去，再看看如今，有吃有穿又有錢花，還不知足，咱貧農、下中農可不能這樣。這叫忘本！”

社黨委會分析了各階層的思想情況，認識到在過渡時期，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無時不在和廣大貧農、下中農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要耐心地教育農民，並引導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要領導農民堅決擊退資本主義的進攻。在上級黨委領導下，立即在全體社員中展開了“是單干好，還是組織起來好；是過去好，還是現在好”的“算細帳、講道理”的討論。大伙細算了單干戶張成、胡振宇的家底，也算了每個社員的家底，結果一般社員比他們的家底增多了近兩倍；也對比了災年產糧情況。貧農、下中農在會上紛紛發言。老貧農李元珍說：“今年這麼大的災，要不入社，還不得餓死！哪個昧良心的說組織起來不好？”

基本群眾起來了，大家一致認為趁着豐年歸還國家的貸款，既有利國家，又有利自己。那些鬧退社的富裕中農和中農一見眾怒難犯也就不吱聲了。

算細帳、講道理大會之後，秋收分配進行得很順利。人們認識提高了以後，又掀起了冬季生產高潮。為了明年在小白樓一帶再開稻田一千畝，社員們又以沖天干劲，在去冬今春基礎上，大興水利。一個冬春，又挖了三條水渠，共計

一千五百米长，約五万土方；又打了竹管井一百零四眼。这样，經過两年的苦战，金星农业社一共有了将近三千五百亩的稻田。一九五七年粮食繼續增产，每亩平均产二百六十斤，总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二，从此摘掉了历史上一向缺粮的帽子，由缺粮社一跃而变成为余粮社。一九五七年除了自給有余以外，上繳了六十一万多斤公粮，同时社內还掌握四十二万斤超产粮。社員的生活也随着全社生产的发展逐漸有了提高。

### 大辯論 “敗子”忘本回头 明是非 生产掀起高潮

秋天，黄橙橙的稻子堆滿了金星农业社的几个大場院，社員們欢欣鼓舞。这是高級社成立两年来的第二次大丰收。但是，在农民中，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因为高級社获得丰收而停息。

社里一些中农如张照虎、张源柱等人，仍然留恋資本主义。他們到上海、沈阳等地长途販运兔子，高价出售。开始时卖一元錢一对，后来卖六元一对，最后有的竟卖到二三十元的高价，牟取大量暴利。而张照虎甚至走上了偷稅、漏稅、破坏治安、扰乱市場的犯罪道路。他們囂張一时，大喊“組織起来不如单干自由”，“合作社有啥优越性，不如我养几只兔子来財”。在这股歪风吹袭侵蚀下，一些地方一时养兔成风，大搞抄肥自摸。这样，农村中又面临着是发展資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在这节骨眼上，

階級敵人也起來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誣蔑高級社，惑亂人心。壞分子劉玉亭編順口溜說：“社里干活熬不出頭，越想越發愁，越干人越瘦！”

為了辨明是非，教育社員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打退階級敵人的進攻，秋收後，社黨委在全體社員中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動全體社員，大鳴，大放，大辯論。一連二十幾天，通過大會、小會、地頭會和個別訪問，發動社員鳴放。鳴放結果，一共給合作社提出一千一百零二條意見。其中擁護合作社、對合作社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點提出善意批評和改進意見的，有一千零四十四條，占意見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而反對合作社的意見只有六十二條，占百分之六。

在鳴放會上，也吸收了沒有入社的七戶單干農民參加。單干戶張成在會上以挑戰的口吻問：“你們合作社整天講優越性，優越性到底在哪裡呢？咱退社以後又置了一條牛，你們有多大家底？依我看，人多亂，龍多旱，母雞多了不下蛋，合作社的生產，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單干好。”

張成發表反對合作社的言論不是偶然的。幾年來，他老想走個人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道路。一九五三年他曾經參加過初級社，那年豐收了，他是個受益戶，當時很高興。一九五四年遇上了澇災，社里收成不如上年好，再加上他為了找愛人，經常往南苑鎮一帶跑，參加社里的集體勞動少，因此當年分配比上年減少了一些。他認為自己“吃了虧”，入社“不自由”，“油水不大”，秋後退社了，走上了個人“發家”

的邪道。他家有父亲、母亲和他，三个劳力，两年来侵占社里的土地十多亩，把合作社集体种的紫穗槐和伙用的大市道，都刨掉开种成自己的土地。单干后的一九五五年是个丰收年，张成卖了自种的棉花，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头牛，加上原来一头，共有两头牛。有了两头牛，有了连侵占社里的十几亩在内的四十亩土地，又从山东老家找来妹妹、妹夫、表弟给他伺弄庄稼，只管饭，不给钱，供他剥削。从此，他自己当上了甩手掌柜，成天骑着自行车在外面游荡，并用低工资雇用外地的农民为他打草，然后高价出售。这以后，他就到处宣扬“单干优越”。逢人便说：“咱单干自由，想干就干，不要请示，不要批准，自己个收多少得多少。”还说：“看咱的自行车就是单干买的，这就是单干的优越性。”一九五六年甚至公开指名要同金星农业社“比赛比赛”。他指着自己的两头牛对社员们说：“看咱的两头黄牛，正壮哩，你们社里的汽车还有个坏的时候，咱的黄牛就比社里的汽车强，不信咱们比一比！”

村里党支部委员和干部们，曾经多次耐心帮助张成，教育他认识依靠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危险的，并且动员他入社。他为了掩人耳目，就找到四合庄的郭云道，老三畚的胡振宇，南苑镇的王拐子，加他一共四户中农，组成一个所谓“互助组”。然后他对村干部们说：“现在我们四家组成了互助组，不也是走社会主义吗？”可是，这些户最近的相隔也有好几里路，远的竟相隔有十几、二十里的，这怎能“互助”呢？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张成已經走上了靠剝削发家致富的資本主义道路了。这是农村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銳反映。由于张成的影响,有的社員也开始羡慕起单干来,說:“还是人家张成行,行走有自行車,耕地有雇工,够多威风!”

大辯論开始了。辯論的中心問題是:“究竟合作社比单干好,还是不好?”在会上,社員們平心靜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一桩桩一件件据理批駁张成說合作社不比单干好的謬論。大伙一共算了四笔帳,帮助张成提高認識,回心轉意,悬崖勒馬,从新富农的死胡同里退出来。

第一,比产量。棉花:全社一九五七年每亩平均产一百二十斤;张成同年每亩平均产八十斤,比合作社低百分之三十三。粮食:全社一九五七年每亩平均产二百六十斤;张成同年每亩平均产一百五十八斤,比合作社低百分之三十九。

第二,比收入。农业純收入:社員一九五七年每户平均三百二十四元;张成同年是二百元,比合作社低百分之三十八。

第三,比家底。一九五七年十月,全社生产資料共值八十八万六千多元,除去偿还政府貸款和社員的投資外,社里淨积累五十五万三千多元,每户社員平均五百五十五元;张成同年十月有老牛一头,小牛一头,耙一个,小农具四件,共值二百二十五元,比合作社低百分之五十九。

第四,比支援国家建設。全社一九五七年上繳公粮六十一万九千余斤,每户社員平均六百二十一斤;张成一九五



七年是缺粮户，由国家供应二百四十斤粮食。

四笔简明有力的帐，算得张成哑口无言，社员们又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对比了解放前、合作化前和合作化以后的生活变化，说明了合作化就是比单干优越，高级社比初级社好，初级社又比单干好。

在会上，老贫农们又启发张成回忆家史，用过去的苦难遭遇唤醒他的阶级觉悟，使他败子回头。贫农李金才意味深长地对张成说：“张成啊，你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这可是昧良心的话啊！你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今天你刚扔下讨饭棍就去打花子，又走起过去地主老财剥削别人的老道来，你想想看，你这不是忘了本了吗？你怎么对得起咱穷哥们呢？”

一席话，说得张成泪珠子簌簌直落。

张成原是山东官县人，父亲给地主扛长活，母亲给地主做零活，自己也扛小活。一家人劳累奔波一年，只能混个“秋饱”。到了冬天，一家四口只好靠出外讨饭糊口。一九四二年山东遭灾，全家忍痛把妹妹卖了，三口人逃荒要饭到河南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地主们怕他们偷东西，不让进村，一家人只好住在村外坟地里。一九四三年又从河南逃到北京南苑南小街村。村里地主嫌他们穷，把他们赶了出来，于是逃到了义生庄。在义生庄也受不了地主于震海的欺负压榨，全家只好再逃到西毓顺。在西毓顺又被坏分子刘玉亭给轰出来，逼得他们一家人走投无路，母亲要跳井，幸好被穷哥们发现劝住了，最后才来到永丰庄。庄里李金才

等一伙穷哥们，东求西告，帮他们找了两间磨棚住下。有了住的没有吃的，一家人还是要饭。一九四七年好不容易求人说情租了地主十亩地种，但收成不好，欠下地主一石租子。大冬天地主把他父亲送到保公所扣押起来，地也被收回去了。解放后，村里实行了土地改革，张成才和广大贫苦农民一样，翻身做了主人，才有了自己的二十六亩地。但当时仍然没有吃的，村干部李金才、苏树业等人，又从穷哥们那里，给他募集了八十多斤粮食和八十多斤白薯，政府又发给他们救济金。他们一家才度过了难关。当时张成感激地说：“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咱早就饿死了。”一九五三年，政府贷款帮他买了一头牛，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一九五四年，他退社后，一天天走上个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土改时的贫农上升为新中农。

社员们引导他回忆这些往事，尖锐地批判了他翻身忘本、误入资本主义歧途的坏思想。大伙诚恳的今昔对比，仔细耐心的分析、开导，终于使张成败子回头，含着满眶热泪，伤心地说：“是咱错了，是咱忘了本！”经过辩论，提高了觉悟以后，第二天他就笑呵呵地把牛牵来入了社。

一场社会主义大辩论，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坚定了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打退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党对农业社的领导。金星乡党委在全体社员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及时地提出要彻底改变穷困面貌，继续向低洼盐碱地进军的不间断革命的宏伟计划。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在志远庄、寿保庄、南小街一带

再开稻田四千四百二十亩，打电井十五眼、竹管井二百二十七眼，挖水渠八条，共計长四千七百五十米。另外开菜田二百亩。这是金星农业社社員們在向大自然要粮的又一次伟大进军。

进军的計劃鼓舞着人們，立即掀起了大規模的冬季生产运动高潮。社員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兴修水利的工程。为了保証质量，提前完成任务，老三畚庄、大白楼生产队把剥玉米等活茬挪到夜里加班去作，騰出白天時間打井、挖渠。团河、小白楼等生产队的社員，为了节省跑路時間，每天天一放亮，拿块干粮就上工地，歇工時用火一燎就吃。社員們的劳动热情和干劲越鼓越高，提出这样的口号：“春节前不完成打井任务，就在井架上吃餃子！”

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多少年来，人們要在这传统的节日里，图个来年吉利，不許动土做活，再穷再苦也得过它三天年。可是这一年，翻了身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員們，在改变低洼盐碱田、拔穷根的雄心壮志的鼓舞下，突破了这些陈規旧习。工地上照旧一片灯火輝煌，社員們用高亢雄壮的劳动号子，代替了除夕的爆竹声。大伙干劲很足，打井进展很快，按計劃完成了兴修水利的任务，为爭取一九五八年更大的丰收，打下了穩固的基础。

## 四、跃进篇

大发展 引起新矛盾

建公社 开辟跃进路

高级社成立的三年，是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三年，也是同大自然战斗的三年。三年来，经过全体社员的艰苦奋战，使六千多亩涝洼盐碱地变成了水稻田。但是，如何使这些稻田真正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米粮川、聚宝盆，这是发展中面临着的又一个新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解决水、肥、劳力等一系列问题。

“水”就是大米，为了水，社员和干部们真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找水。一九五七年冬，金星农业社在东边和德茂农场共同在东高地合修了一座扬水站，引凉水河的水灌溉；又在西边和黄村、西红门农业社合修渠道，用虹吸管办法引永定河水灌溉。

但是，一九五八年遇上春旱，夏季插秧急需大量用水时，各个农业社之间发生了用水矛盾。金星社插秧需用水，其它社插秧也需用水。金星农业社和德茂农场共同在东高地修的扬水站，位置在大红门及和义农场的下游，上游大红门和和义农场用水一多，金星和德茂就没辙了，只好把两个水泵停掉一个，并在分水口处，用木板隔住，保持相等距离，控制水流量。但是水量小，加上沿途流程中渗漏蒸发，真正流到田里的水就非常少了。

眼瞅着稻秧插不上，各农业社社員都急了眼。德茂的人堵住西面的分水口，不让水往金星流；金星社員一看渠里沒有水，也不相让，連忙去堵南面流向德茂的流水口。两地农民你去我来，經常爭吵。后来經過两社干部协商，双方定时輪流用水，各用十二小时。这样怎么能够滿足插秧用水的需要呢？

另一处，在永定河上用虹吸管办法吸水，水量本来就不大。到用水的时候，黄村农业社在上游，只放下来两三个水<sup>①</sup>，流經西紅門农业社时用去一多半，沿途蒸发滲漏，最后流到位居下游的金星社，連半个水也不足了。节气不等人，金星社干部沒有办法，只好找西紅門社干部要求他們停用三天，放水給金星社突击插秧。西紅門社干部們心想，平日跟金星社关系不錯，修渠时金星社出工最多，按說應該照顾一下。但在这干旱关头，“水”是关系着社里一千多戶人家生活的大問題，也不好私自作主。于是他們对金星社的干部說道：“等我們和社員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們。”就这样往返商量交涉，拖延了時間，誤了季节。这一年，金星社六千多亩稻田，只插上了四千二百一十亩，还有一千几百亩沒有插上秧，不得不临时改种老玉米和高粱。

在灌溉方面发生的这场人与自然灾害的斗争，結果却引起了人与人、社与社之間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实践中，人們逐漸体会到，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打破社界、全面

---

① 水流量单位。每秒流一立方米的水，俗称“一个水”。

规划,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

随着土壤改良,旱地变水田的发展,农业劳动力也开始紧张起来。麦秋大忙季节,各种活茬,都挤到一起,一时又要割麦,又要插秧,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社员起早恋晚地干,还是免不了耽误节气。国家贷给两台拖拉机由高级社使用,但大田土地没有平整,地界多,地段小,拖拉机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一耕地就陷进沟里。在劳力吃紧的大忙季节,开来拖拉机,本来是“雪里送炭”的事情,社员们高兴地说:“来了铁牛,咱们就不用愁赶不上季节了。”可是谁料,拖拉机开进地里,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只听隆、隆、隆的一阵轰响,半晌动不了窝。真是越忙越出事,社员们埋怨说:“这样小的地块,要拖拉机耕,还不是土地爷掏耳朵——搔泥?”大伙议论说:“咱们要象南同顺农场似的,把土地连成一片平整好,机器耕地、机器播种、机器收割,那该多么美气!”这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愿望和要求。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稻地要有大量肥料,才能增加粮食,提高生产。当时各农业社在南苑镇肥料站买的肥,社里小型猪场积的肥,加上社员户积的家肥,都解决不了生产所需要的大批有机肥料,许多地没有肥料可上,成了“卫生地”。要从根本上解决有机肥料问题,就必须大量发展畜牧业,可当时农业社的生产规模,连务农的劳力还感到紧张,哪里有力量发展畜牧业呢?

在这些事实面前,农民们深深认识到:众人拾柴火焰

高，組織起來力量大，必須進一步聯合起來。

當時海子裡的一些高級農業社的社主任和黨委書記，碰在一起時，就醞釀着聯合起來的事。不久，舊宮、紅星、鹿圈等幾個高級農業社聯合起來了。金星農業社的幹部和社員們，見他們幾個社聯合起來了，也都紛紛來到鄉黨委會、社管理委員會找書記、主任，打聽什麼時候才能合併。有的甚至催促說：“你們趕緊去縣委說說吧，咱們也同他們聯合起來。”社員們在地頭上、大道上，見了幹部也打聽、催問。經過社幹部代表社員多次向縣委申請，終於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紅星、金星、舊宮、西紅門、鹿圈等五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爲一個大的集體生產單位了。

八月，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總結了全國五億農民的偉大創造，正式發布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九月，海子裡地區這個合併不久的大集體生產單位，正式命名爲“紅星人民公社”。金星高級農業社成爲紅星公社的一個大隊，命名爲金星大隊。

從此，金星的社員們躍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人民公社這個組織中，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着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開始奮勇前進了。

**種小麥 深翻密植獲高產  
辦牧業 自力更生顯威力**

人民公社成立後，金星大隊面臨着兩項主要任務，一項是繼續興修水利，爭取糧食繼續增產；一項是深翻密植，大

种小麦，彻底摘掉海子里小麦低产的帽子。

大队党总支提出的这两项发展生产的任务，立即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但在干部会上却碰到了阻力。当时混进南同顺生产队干部队伍的坏分子魏成俊说：“又要深翻种麦，又要调人修水利，这样干，社员受得了吗？”“那么，你说怎样办好呢？”干部们异口同声地问他。他支支吾吾，老半天不肯说清自己的意见，最后才嘟囔道：“依我说，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也不难，只要按‘井田制’的办法办就准成！”他具体解释说：“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按‘井’字形，分成九等份，周围八块分给大伙，中间一块大伙分种，收获归公……”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干部们识破揭穿了。会场上立刻热烈地讨论起来。副大队长衡顺义站起来质问他：“你这不是要闹变相的分田到户，走回头路，把大伙拉回资本主义吗？”魏成俊一看势头不对，立刻自我打圆场说：“我是瞎说白道，大伙何必当真？”大伙听了更加气愤：“什么叫何必当真？你要把大伙往资本主义的火坑里推，我们不当真还得了吗？”

一场争辩，使干部们认识到，要想进行生产斗争，必须提高警惕，开展阶级斗争，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会议一致议决，整修全大队排灌系统和开凿电机井的工程，立刻上马，同时深翻种麦，夺取明年小麦大丰收。

大队党总支的决定，立即变成了广大社员的行动。社员们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战斗。

北京九月的早晨，很有一些凉意，而社员们心里却是暖



烘烘的。人民公社成立的喜悦，争取来年大丰收的雄心，鼓舞着社员们，天刚放亮就到地里你追我赶地深翻地了。大伙不但比谁翻得快，还比谁翻得深、翻得匀。互相用尺子量深度检查质量。每亩麦地施足底肥五千多斤，种子用的是优良品种“农大183”。

一些老农看到大伙干劲这么足，底肥这么大，地翻得这么深，种子又好，又高兴又担心。担心翻上生土来，麦苗太密会发黄捂死。但是社员们细致的田间管理和适时地追肥，终于打消了老人们的顾虑。深秋的田野，麦田里一片新绿，麦苗比哪一年长得都壮实。

另一支水利大军，按照全公社的统一水利规划，投入了挖修蓄水库、建造节制水闸、疏浚排灌系统等工程的战斗。社员们夜里九点出发，连夜开到工地，马上投入战斗。两班人马轮班，昼夜不停地干。打电机井的社员们，不仅肯于苦干，也善于巧干，使打井进程大大加快了，原来第一眼井凿了四十多天，而第三眼井的深度和地质情况跟第一眼井大体相同，却只用了十五天。这一年新打的三眼电井，保证了三百亩稻田的用水。

经过一冬的奋战，兴修的水利发挥了一定的效力。一九五九年虽然同样春旱，由于公社内各大队的互相支援，合理安排用水，金星大队插秧面积，比上一年增加了六百多亩。

插完秧，紧接着麦收。社员们望着一片一片黄熟的麦子，低垂着沉甸甸的金穗，喜在心里，笑在脸上，齐声夸耀

道：“有了人民公社，才有这样好的小麦。”曾經怀疑过深翻密植的老农們，也来到麦田边，兴奋地說：“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这年头，庄稼也跟着社会走，人跃进，地也跃进了！”麦秋后，核实产量，平均亩产四百零一斤。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金星大队的社員們，并没有滿足已有的成績。他們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繼續乘胜前进。

俗話說：“人吃肉，地吃臭”，当水解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肥料必須跟上去，才能持續增产。社員們又投入了建設肥料基地的攻坚战。公社化以后，由于生产規模大，劳力可以統筹安排，加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大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畜牧事业。一九五九年在“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方針指导下，首先大办养猪事业。

养猪先得修建猪圈。采取什么方法建圈？是自力更生，还是伸手向公社要？是少花錢多办事，还是多花錢少办事？广大貧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一致主張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人們說干就干，一面派人去外单位学习烧砖技术，一面請市輕工业局同志来做技术指导，立即在新建、大生庄、南同順三个地方，建立了四座窑。从挖粘土、打坯、烧窑到出砖，全部由社員們自己干。大伙热情很高，就連八、九岁的儿童，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也加入了这个劳动大軍，帮助运土、和泥。人們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好天坏天，都坚持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摸索經驗，提高技术。

砖，终于烧出来了，经过三十几天苦战，烧出了一百多万块。有了砖，社员们又以同样的干劲烧瓦建圈。就在这年秋天，分别在大生庄、新建、团河、南同顺等地，建了五百多间猪圈，兴办了六个猪场。

猪场建起后，从各生产队挑选了一批贫农、下中农骨干和干部当饲养员。党把为集体发展养猪事业的重任交给他们，他们非常兴奋，贫农王元道说：“在旧社会莫说养猪，连人还吃不饱哩！今几个党叫俺养猪发展生产，俺愿意养一辈子猪！”话虽朴素，却道出了贫农、下中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意。

饲养员们坚持了勤俭办事业的方针，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开始时，饲养员们没有住处，就住在刚刚建起还没有放猪的猪圈棚子里。猪吃的粉浆，全靠饲养员一担一担地从半里来地的粉房挑来，然后用人力拉风箱煮，劳动强度很大。可是大伙干劲很足，心眼里只有一个想法，多养猪、多积肥、多支援国家建设。

更大的困难是大伙对于大量集中养猪没有经验，对猪的食量控制不好，也不会管理，猪生气喘病的多，小猪死亡率也高。饲养员们见死一头小猪心里很难受。老饲养员董怀德说：“死一头小猪和多生一头小猪，看来都是个‘一’字，这可差的大咧，咱是公社的社员，养猪可得格外经心。”

困难是压不倒硬汉的。饲养员们一方面细心观察猪只的日常动态，查看猪的粪便和尿的颜色，发现尿黄就喂青菜，或者出外打青草喂，给猪“退火”；母猪下崽时，日夜守在

一旁照看。另一方面，向附近南苑兽医站請教，学习一些科学常識，学会給猪治病。經過苦学苦练，他們已經从开始时連溫度表都不会看的外行，学成了会給猪治疗一般疾病的“半拉大夫”。

由于飼养員的兢兢业业，穿干苦干，大队集体养猪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一九五九年底，全大队集体养猪累計总数达到了五千多头，平均每人一头多。

在大办养猪的同时，养鴨事业也兴办起来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大队派出貧农社員王桂英等人，去市食品公司学习喂养填鴨和种鴨的技术。填鴨是北京的特产，可是金星大队的农民在公社化前，誰也不知填鴨是什么，更甯說养它了。不懂就刻苦学习，王桂英等人仅仅学了二十八天的时间就“毕了业”。在全国人民欢度“五一”节这天，王桂英等从城里买来了两千多只鴨黄，当时既沒有場房，也沒有設備，他們就临时借了两間屋，把鴨黄安置下。鴨場就这样因陋就簡地創辦起来了。

这一年牛場也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从附近农場里轰来一批老、残、病、弱的淘汰牛，白手起家創辦起来了。

同时，各种工副业生产也兴办起来了。各生产队利用海子里天然生长的葦子和蒲草編席、制帘，根据需要建立了釘馬掌、修理自行車、粮食加工等修理加工业，使副业生产紧密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这些事业的大发展，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反映出广大社員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旗帜的指引下奋发

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

**齐跃进 农牧副渔大发展  
展宏图 前程似锦干劲增**

“跨上跃进马，喜看好收成”。主宰了自己命运的金星大队的社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生产是逐年发展，各项事业越办越兴旺。

一九六〇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万斤，但是全体社员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奋发图强，夺取一九六一年丰产。结果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四百七十九万六千斤，比一九六〇年总产量增加一倍！社员们意气风发，持续跃进。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六百二十万斤，比大丰收的一九六一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供应了首都猪肉八万三千斤，牛奶一百三十二万八千斤，填鸭五万三千只。猪、牛、鸭场总共积肥二千多万斤。

比农业大丰收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是，这一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报象指路明灯一样，及时地指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社员们读了以后豁然开朗，更主动更自觉地跟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开展了坚决的斗争，清算了几年以来他们散布的坏影响。从此，干劲更加充沛，持续跃进，一九六三年又获得了大丰收。

这一年粮食比一九六二年又增产了百分之五，平均每人占有粮食达到一千三百斤；供应首都的副食品比一九六二年又有了增长，猪肉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七；牛奶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填鸭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积肥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一九六四年粮食虽因水稻遭受严重的白叶枯病、小麦遭受锈病比上年减产了，但牧业生产仍然持续发展，供应首都的猪肉比上年度增长了几乎一倍，牛奶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

这不是一些简单的数字，这是一篇篇壮丽的诗章。它们显示了解放了的金星大队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跃进雄姿。

公社化六年以来，金星大队的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全大队一共平整了土地一万三千多亩，把七千多亩低洼盐碱地，改造为高产稻田。水利化程度逐步提高，四十七眼电井已经实行了机械配套，由一条主要灌渠和十四条干渠形成的水利网，使全大队有一万五千亩土地能浇上水，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七，比公社化前四千多亩水浇地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五。水利化使复种指数越来越大，大部分大田两年可以三熟。堤坡道边种植桃李等果树，还开辟了葡萄园，全大队共有果园五百二十七亩。

集体“家底”越来越厚，机械化、电气化程度逐年增高。现在全大队拥有拖拉机十一标准台，每台负担耕地一千五百亩，载运汽车四部，耕、耙、播种、中耕全部使用机器，基本

上實現了機械化。糧食脫粒、加工，用上了機器，社員戶再也不必抱着磨杆推碾軋磨了。在電氣化方面，全大隊共有高低壓輸電綫一百七十八公里，變壓器二十五台，電動機八十二台，使農田灌溉全部實現了電氣化。

一九五九年全體社員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興辦起來的豬場、牛場、鴨場，已經發揮效用。不僅供應了首都肉、奶、填鴨等大量的副食品，而且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大隊按着農牧結合、相互促進的方針，對畜牧場進行了調整和規劃，現在共有四個豬場，兩個鴨場，一個牛場，平均每兩平方公里就有一個大型畜牧場。這些畜牧場所積的有機糞肥，基本上滿足了農業的需要。一九五九年以來，興辦的工副業生產也鞏固下來，緊密地為促進農牧業生產發展和便利人民生活而服務。

農、林、牧、副、漁各種事業都日新月異地發展起來了，需要增添新的力量，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從一九六一年起，有四百多名中、小學畢業還鄉的知識青年以及從北京城裏來的高初中畢業生，參加了農業生產勞動。他們把文化帶到了農村，決心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新型農民。金星大隊的老一輩人，對他們寄托很大的希望，花費了很多心血培養他們。志遠莊黨支部書記蘇樹業在歡迎回鄉知識青年會上，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解放前咱們這裏只有一個中學生，那還是地主的少爺。現在你們有了文化，可不要忘本，在勞動中好好鍛煉自己。我們這一輩子人都老了，建設共產主義就靠你們來接班了！”

这一批新生力量在老一輩人培养教育下,在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很快地锻炼成长起来。在劳动中,他们不同程度地学会了耕、耙、除草、开苗……等农业活茬。实际的劳动赢得了社员的信任,很多人被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会计、计工员,有的当了生产队长。他们不仅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把文化带到了农村,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他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著作中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他们活学活用,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鸭场的青年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后,检查了“干不干三顿饭”的混饭吃的思想,促进了思想革命化,改进了鸭场的工作。很多青年是毛主席著作不离身,一有空闲就学。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大队一共组成了五十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同时,以知识青年为骨干,各个生产队还成立了俱乐部、文艺组,配合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经常自编自演一些文娱节目,活跃和丰富了社员的文化生活。

金星大队的农民在坚持生产斗争同时,还进行了许多科学试验。鸭场的社员们,想办法为集体增加财富,他们大胆设想,经过多次试验摸索,改进了种鸭和鸭黄饲料的配方。过去种鸭吃熟的黄豆、玉米、黑豆混合料,现在改用生的高粱、玉米、豆饼、糠混合料;过去鸭黄只喂小米、绿豆,现在改喂玉米、高粱、糠皮。这种新的配方,不仅比原配方含的营养更全面,更适合鸭子生长的需要,并且节省了粮食,



降低了成本。

在农业上，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干部，都普遍跟社员们一起种植了“试验田”和“样板田”，一些生产队还成立了农业技术小组。经过试验比较，普遍推广了水稻“水源300粒”，小麦“农大183”、“农大311”、“北京5号”、“北京8号”、玉米“白馬牙”、晚玉米“八趟白”等优良品种。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社员收入逐年增多，一九五九年社员平均每户收入三百八十四元，到一九六三年就增到五百八十一元，比一九五九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三。社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许多社员盖了新房，每个人通常都有单、夹、棉等好几套衣服。在前面“血泪篇”提到的贫农王元道，解放前吃没吃，穿没穿，住没住处，全家六口从山东逃荒来到大白楼，两三年工夫连饿带病死了四口人。现在他说：“俺家的日子跟大伙一样，好似吃甘蔗，一节比一节甜，越过越甜。”现在他家有七口人，夫妻俩和五个孩子。大孩子上了小学。夫妻两人在队里劳动，全家人夏有单，冬有棉，全年口粮有一半是大米、白面等细粮。公社化以后，盖了新房，置了自行车、收音机、闹钟等生活用品。象王元道一家的生活，在金星大队里还算不上是最好的；劳动力多的社员户，生活就更好一些。

全大队一千多户社员，都用上了电灯照明，有三分之一的人家买了收音机，五分之二的人家置了自行车。以建新庄为例，这里解放前叫“华美”庄。一九三七年前后，这个庄

只有二十多个单身的长工和佃户，全庄见不到一个妇女，解放前夕才逐渐迁来四十来户人家。解放前，他们饱受封建主义和美、日帝国主义的剥削蹂躏。解放后，庄子回到它真正的主人、翻身农民的手里，人们要在这里展现建设崭新的人间乐园的蓝图，废掉了“华美”庄这个耻辱的名字，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把自己的庄子正式命名为“建新庄”。这个崭新的名字，既标志着庄子的新生，也显示了这里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现在全庄共有四十户，有缝纫机七台，收音机十五台，自行车二十五辆，闹钟手表四十多只，生产队里还有电视机一台。解放前后对比起来真是地狱和天堂，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解放前一些农民最高理想是“粗柴细米不漏房”，而现在社员们早已达到了或者超过了这个水平。过去，“识字断字”那是地主家的阔少爷独享的权利，今天全大队兴办了两所中学，三所小学，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子女都上了学。此外，全大队还办了二十三所托儿所，一所敬老院，使幼儿有人教养，孤寡老人度着幸福的晚年。

但是，坚持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金星大队的农民，并没有满足已得的这些成绩，特别是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决心继续艰苦奋斗，不断前进。正如党总支书记冯雪海所说的那样：“我们金星的社员，要站在金星，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我们前面的路程还长着哪，广着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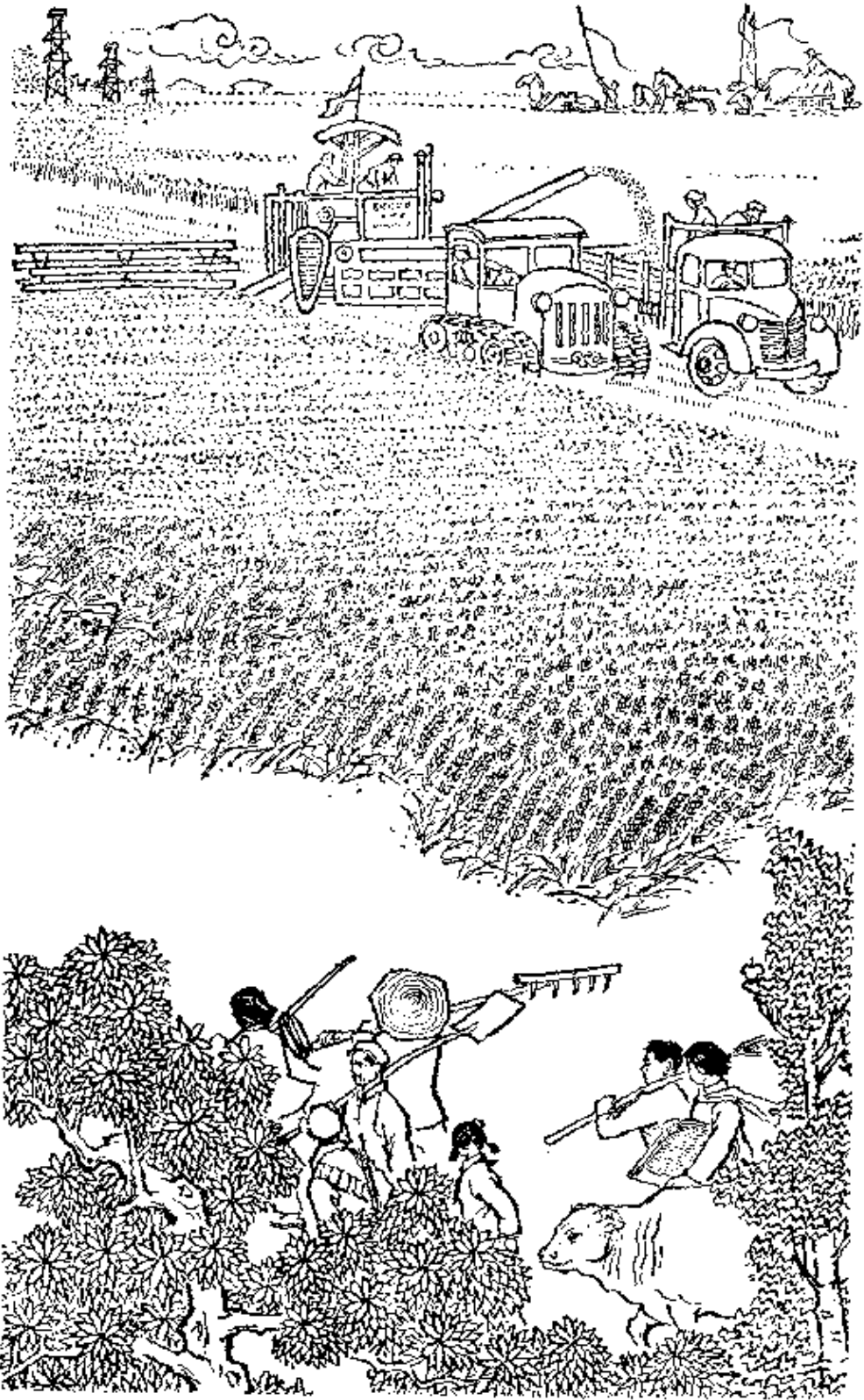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金星大队的社员们在学大寨、赶大寨、夺

取粮食更大丰收的口号鼓舞下，元旦刚过，就开始了“双泡子”积肥大会战。从“双泡子”里挖取积存多年的老河泥做肥料。这样既可以增加肥源，又能使泡子多蓄水多养鱼。

当时正是三九寒天，参加会战的除了青壮年社员以外，连五十几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子，也不顾党支部和队干部的阻拦，争先恐后地参加了战斗。很多社员夜里两三点钟就起来，掖上几块毡子，迎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工地，凿开一尺多厚的冰层，大干起来。

在工地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新建四队的刘玉兰、刘兰英、张淑琴、孔淑田等十小姐妹。她们都是贫农、下中农的女儿，是一九六三年的小小学毕业生和初中学生，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十五岁。当时生产队还没有把她們算做主要劳动力。“双泡子”大会战开始后，这帮小姑娘坚决要求参加战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家乡早出一把力。她们清晨两三点钟就互相招呼起来，从新建队走十里路赶到“双泡子”，马上挑起土篮，奔跑在来回二百米运肥路程上。她们人小志大，跟成年人一样每人每天挑两方多冻土，肩膀压得红肿了，磨破了，流血了，也从不叫一声苦。她们在党总支的关怀下，正式成立了“十姐妹”组。她们在“双泡子”积肥大会战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赢得了社员们的普遍赞扬。

苦干结硕果。八百个社员奋战了四十五天，一共挖出河泥七万方，积肥九千多万斤，使大队一万七千多亩土地，平均每亩增加了五千多斤肥；使双泡子多蓄水七万方，在干



李中貴圖

早时能够解决八个生产队七天的农田用水，也能扩大大队的渔业生产。现在泡子里已经新放养了十万尾鱼苗。

永远革命，跃进再跃进，这是金星大队社员们一致的心愿，一九六四年，金星大队在全公社的统一规划下，制定了七年发展的远景规划。

这项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的排灌系统。全体社员在一九六四年冬和一九六五年春，修建一条由北到南纵贯大队的排水渠，渠深二点五米，长六千五百米，宽十六点五米。这件工程的完成，将来到了雨季，即使是连续降三百公厘的雨，田间积水也能很快地排出，基本上解除涝灾的威胁。并且七年内实现自流灌溉。目前多半是用机器提水灌溉，每个提水工具只能灌溉一百亩地，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实现了自流灌溉以后，排灌系统成网配套，从而真正做到主宰天时，旱浇涝排，年年高产稳产。

规划中还计划沟道改直，土地三五百亩成方连片，以节约土地，便于排灌，便于机械耕作。到那时，这里道路平坦笔直，交通畅达，路旁绿树成荫，田间林带交错，泡内游鱼成群，岸上果树成行……；到那时，金星大队的面貌将比今天更加壮丽，社员们将迈开更大更稳的步伐向前跃进！

（金星队史编写组编写）

## 要把革命鬧到底

——記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志遠莊生產隊  
黨支部書記蘇樹業的家史

一九六三年春節，蘇樹業胸前佩帶農業勞動模範獎章，和許多英雄模範以及首都各界代表人物一起，踏上了巍峨壯麗的人民大會堂的石階。他是應邀來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歡度春節的。

到了門前，蘇樹業突然停住腳步。他把自己手里那張大紅請柬，緊緊地貼在心窩上。他只覺得一股暖流沖上胸口。幾十年前的春節景象突然在眼前閃過，他的耳邊仿佛又響起了媽媽那沉痛的哭聲：

“小兒呀！媽不能再拉扯你長大啦。你，該扛活就扛活，該要飯就要飯去吧……”

蘇樹業抹抹眼睛，跨步走進正門。他那心底，波濤洶湧，翻騰起了苦難久遠的過去和艱苦鬥爭的往事……。

“媽，我死不了……”

三十五年前，在老家山東省東阿縣。

小树业过十三岁的生日，正是全家断炊的第四天。他四哥眼看树业饿得不能动了，含着眼泪，跑到伪大乡长刘洪翰家地里，摘了几个雨水泡烂了的西瓜崽子。刘洪翰抓住树业四哥，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奸声笑道：“你不是想吃瓜吗？来，我喂你！”

刘洪翰拿起镰刀，刺一块西瓜就往他四哥嘴里填。他四哥不吃，刘洪翰就拿起镰刀撬开他的牙，硬逼着他四哥把几个烂瓜，连皮带籽，都吞了下去。直到把他肚子撑得鼓鼓的，直吐绿水，刘洪翰才将他放下来恶狠狠地說：“吃饱了，快奔家跑吧。跑慢了，我可打啦。”

刘洪翰掬开棒子在身后追打，他四哥捂着肚子一路呕吐往前跑。沒跑多远，两眼一黑，倒在一扇大門后边。刘洪翰看看四外没人，歪肩膀猛一扛門，只听啊呀一声惨叫，他四哥倒在了一片西瓜绿水之中……

这年的庄稼，春旱夏涝，剩下几棵好苗，被扑天盖地飞来的蝗虫吃个精光。到了大秋，籽粒沒收。全家饿得抱成一团痛哭，那头小壮牛也沒草沒料，臥在树业身边号叫。一家人实在挺不过去了，老爹爹只得咬咬牙，提条口袋，去向一个本家豪富的叔伯爷爷借粮。

那老头子捻着八字胡，假装埋怨地說：“沒吃的不早来！我有一口吃的，就不能叫儿孙們饿着。”說着，叫人給量了一小口袋紅高粱。

爹爹感激地說：“这高粱，到明年秋后还……”叔伯爷爷打断他的話，說：“还不还的，提那个干嗎。亲不亲，一家人。

你們沒吃食，找我来；我要用什么，找你們要。誰叫咱們是叔侄爺們儿呢！”

吃完了一小口袋，叔伯爷爷又“爽快”地借給了一小口袋。左一小口袋，右一小口袋，不到两个月光景，借了一石多。轉眼到了年关，家里又揭不开鍋了，爹爹只好再去求借。

这回，不等爹爹說話，叔伯爷爷就开了腔：“大侄子，眼瞅年关逼人，我也里外吃紧。你借的那高粱，紧紧手还給我，叫我也过个年吧！”

爹爹把空口袋往地上一鋪，苦苦求情。半天，叔伯爷爷才长出口气，假惺惺地說道：“唉，要将人心換人心哪。瞅你們爺們儿孩子可怜，我熬苦点，再給你們几斗高粱。可是，你們那头壮牛和那三亩地，来年就匀給我使了……”

爹爹象被悶雷击了头頂，傻呆呆地釘在地上愣着。半天，他才滿臉流着泪水，說：“五叔，那可不行啊。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

叔伯爷爷一豎眉毛，慢条斯理地說：“我也不亏負你这一辈子心血，前前后后，不是給你两石高粱了嗎！”

爹爹扑倒地上，泣不成声。叔伯爷爷突然把臉一沉，冰冷地笑道：“好，不行拉倒。明儿是腊月二十三，你把高粱送来吧。按老規矩，四分利，我一粒粮食也不多要……”他扭头进了內屋。

爹爹登时发了懵，跌跌撞撞回到家里。老北风打破窗口，打断牆縫穿进屋里，扫得全家人凄凄凉凉，老老少少一



起痛哭。捱过小年，腊月二十八大清早，叔伯爷爷派人闖进小树业家，高声叫道：“老东家說了，三亩地不要了，光把小牛拉走。”一边說，一边解牛头绳。树业全家哭着跑出来，扑到牛身上。只見老爹爹双手摟住牛脖子，悽慘地叫道：“我的牛，我扑奔了一輩子的牛啊……”

小壮牛被拉出柵子門，扭回头来哞哞哀叫。爹爹一仄身，搖搖晃晃往前一扑，扑通倒在地上，嘴里呼嚕呼嚕直吐白沫子。从此一病不起，沒几天就咽了气。

家中生活无着无落，大哥二哥下关东闖蕩，三哥也独自奔外寻覓生路去了。

新年正月十五夜里，天空横飞霰雪，闖人家在房頂上放着彩色云灯。小树业的媽媽，給树业包了一頓高粱面掺榆皮面的“餃子”。娘儿俩和三个姐姐，哭噎失声，哪里有人动筷子。树业娘从身后拿出一个輕飘飘的“行李卷”，亲着树业的小脸，刀子剜心一般沉痛地哭着說：“小儿呀！媽不能再拉扯你长大啦。你，該扛活就扛活，該要飯就要飯去吧……”

頂着芒尖子般的北风，迎着攪天冰雪，娘儿几个把小树业送出村口。小树业穿着露膝的单褲，腰里掖着那十二小两重的“行李”，渾身冻得直打顫。他拉住姐姐們的手，眼眶里热泪簌簌往下滾，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你們替我照看媽媽吧，我，我……我走了。”

媽媽摟住他，哭着說：“小儿呀，你要活着，就給家捎个信儿来。”

小树业的眼里，血絲通紅。爹爹，四哥，小牛……家里

所有的苦难和仇恨，都一下子冲上心头。他瞪起虎彪彪的大眼，紧紧攥上拳头，一字一顿地对妈妈說：

“媽，我死不了！……”

“你給长多少錢，我也不干了！”

小树业离开故乡，听说三哥在北平南苑大生庄扛活，便討飯要吃，一步步捱过一千多里地，找到了三哥。

三哥在大生庄地主生聿丰家做飯。苏树业刚落脚，就和三哥一块儿去見生聿丰的爹生富业，想找个活儿做。生富业一打量，只見眼前站着一个孩子，又矮又小，胳膊腿細得跟棒子核儿一样，就麻搭下眼皮，說道：“白干活也不要。”哥儿俩为了吃口飯，跪下求情。生聿丰的大管家孙老六伏在生富业耳边唧咕了几句，生富业点点头，孙老六这才縮脖端腔地叫道：“老东家吃斋念佛，专好修桥补路惜老怜幼。东家发个慈悲，留这小东西試試工。”

苏树业試了半年工，每天除了两頓稀米湯餓餓之外，分文不掙。过了不久，三哥累病了。孙老六見他三哥已經不中用，便把他三哥的烂被套子往外一扔，喝道：“你另找好差事去罢，我們这儿不养大爷！”

扛活的穷哥儿們給湊了点盘纏，小树业把三哥背到黃村車站，送回老家去。沒出一个月，可怜的二哥就去世了。

从十四岁到二十岁，苏树业在生家扛了七年活。

苏树业二十一岁这年阴历四月二十七，孙老六把苏树业叫进了生家大厅，生富业突然摆出一副笑脸，叫着树业小

名儿，說道：“老五真是個鐵孩子。我雇這麼多人里，還沒見過這麼經得起棒打的棒活。老五呀，打明兒起，你就甭下地了，留在家裡做飯吧。”

蘇樹業心裡猛一哆嗦。給生家做飯，這是道鬼門關。他三哥葬身這裡；八年來，他又看見十來個漢子倒在了這關口上。生富業見樹業打愣怔，便又說：“老五啊，在我家做飯，還沒人拿下過一年的。你拿下一年來，我多給你長五塊錢。”

第二天，蘇樹業硬著頭皮，踏上了鬼門關。且說這生聿丰家，老少爺兒們有三十幾口，一日三餐，必得準時準點；又雇了三十多長活，三十多短工，早晨晌午，還都得挑出幾里地，把飯送到地頭上。前後總共百十口人的飯，按生家老例，卻只能雇一個大師傅，不許有人幫工打雜。蘇樹業咬牙頂著干了些天，這一日，生富業出來查莊子，見樹業買了兩個面口袋，便擺出一副假慈善的模樣來，問道：“老五，買這東西做嘛？”

蘇樹業來了七八年，穿著沒添一件。樹業說：“我想縫個褂子。”

生富業眼睛一眯，捻著念珠說：“唉，真是苦命人。來來來，我給你找人做去。”

蘇樹業兩手緊抓住面袋不敢放。孫老六打旁邊走上來，一把奪過口袋，罵道：“混蛋，還不快謝謝東家。”

生富業齧開大黃牙，拿嗓子眼咯咯一笑說：“老東老伙的，謝啥呢，多做點活就有了。從今往後，每天你再喂豬喂狗，把牲口料給炒炒，還有那兩盤石磨歸你推……”

苏树业心里連声叫苦，沒等他吭出声，孙老六就凶神恶煞似地斥責道：“还不快干活去！”說着就連推代搯，把苏树业赶去干活了。

从这天起，苏树业除了做飯送飯，又加上挑九十挑子水，推两盘石磨，喂八口猪，十八条狗，炒十二头騾子和一头牛的大牲口料……，二更天睡不下，三更天又得起来。白日黑夜里，累得筋骨酸，腰腿疼，脊梁成了罗鍋，不到一个月，眼見渾身消瘦下去，漸漸脫了原形。这天前晌，苏树业挑着两桶水和一大筐籬窩头往地里送飯。刚撂下挑子，只觉心口火辣辣一热，咕嘟嘟吐出一大口鮮血。苏树业頓时头昏眼花，两腿綿軟，扑通摔在地上。好半天，才喘出口气，耳边只听得一个老长工叹道：“树业呀树业，財主拿小恩小惠买你的命哪。你哥哥死在这虎口里了，你快逃生吧！”

自此，苏树业身体頂不住，心里手上也就都怠慢下来，只想瞅个空子逃走。孙老六看出了这个苗头，便不是打就是罵。

有一天，生家那十八条狗打架，一下子咬死了孙老六养的那条狗。孙老六逮住这个机会，举着三齿，跑到厨房門口，把傢伙朝門里一捅，高声罵道：“苏树业，你出来，我拿三齿糝死你个杂种。”

苏树业摸不清头脑，在屋里应道：“你凭什么罵人！”

孙老六两脚乱蹦，又罵道：“你喂的狗咬死了我的狗，你是存心欺負我孙六爷。你出来，你得給我那条狗偿命！”

苏树业一听，火气猛撞上来。瘦弱的身体不知打哪儿

冲上一股劲，回头抄起挑水的扁担，双手一抖，扁担钩子嘩朗朗直响。多少年来凝聚心头的苦痛和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大吼一声：“你们是逼哑吧说话呀，我先打死你个杂种养的孙老六！”苏树业冲出门，一扁担掄过去，打掉了孙老六手中的三齿，又一扁担砸下来，孙老六抱着脑袋，爹妈乱叫，撒腿就跑。苏树业瞪圆了两眼，紧追不舍。看看刚要赶上，旁边闪出了生富业。他也顾不得平日嘴脸，拦腰夺下了苏树业手中的扁担，尖声吆喝，叫人来捆苏树业。

这时，扛活的穷哥儿们都收工回来了。听说要捆人，一声喊，把孙老六、生富业围在中间。穷哥儿们大叫：“别等你们一个个鞣死我们了，干脆，我们一块儿辞工。”“东家的狗咬死管家的狗，叫我们扛活的偿命，我们不干了！”

生富业一见短工、长活们都把家伙扔在地上，心知这农忙关头，众怒难犯，忙又换出一副脸子，装腔作势地说道：“得得，都好好干活去，这事由我处治。”

可是第二天，生富业突然叫换活茬儿，把短工长活们一齐赶到离庄子最远的地里去割豆子。穷哥儿们刚一走，孙老六就勾来伪大乡长王连玉，要把苏树业捆往双泡子。扛活的穷哥儿们听说这事，都一阵风似地跑回来。每人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围上了孙老六和王连玉。王连玉一瞅阵势不好，仓皇遮掩几句，夹起枪来早自溜了。穷哥儿们火了，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今天这样整治树业，明天说不定又这样整治谁。咱们拧成一股绳，一齐歇工，都不给他干了！”“孙老六骑在咱脖颈子上拉屎，欺负咱好苦！这回非叫他在咱



郭振华 图

們面前低头不可！”

穷哥儿們一齐罢了工。过了一天半，生富业見地里要荒，不敢再僵持下去，这才又磨磨臉，把孙老六拉出来，“罵”了一通，叫孙老六給苏树业賠了不是……。

晚上，扛活的穷哥儿們湊在树业屋里，都劝他赶紧离开这凶险的地方。正巧，有个穷哥儿們从南口来信，叫苏树业去当架子工。苏树业立刻收拾好行装——八年了，依旧是那个十二小两重的“行李卷”——辞工不干了。

生富业装做和顏悅色地說：“咱老东老伙的，不記仇。得，你別走了，我再給你长錢。”

苏树业立起两眼回答：“呸！我算看透了你們。你給长多少錢，我也不干了！”

四更天，跟穷哥儿們道声“再見”，苏树业就直奔南口，当架子工去了。

### “打死我們，也不上工！”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抓了苏树业他們許多架子工，去塘沽修新港。钻进十几米深又苦又咸的海水里去砸桩，每天都有工人弟兄丧命。

有一天深夜，一个工人弟兄被日本技师下的桩給砸死了。苏树业憤怒地去找日本人讲理。日本鬼子軍官田中說：“中国人的大大的有，死一个两个的沒有关系。”苏树业叫日本人埋葬那位工人弟兄。田中罵道：“八格牙嚕，你的多管閑事的不要！中国人的統統的不要埋葬，拉到外边叫狗

的咪唏咪唏的！”<sup>①</sup>

苏树业气得两眼珠子通红，浑身哆嗦，一跺脚，跑出来。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誓不宰你们几个王八蛋报仇，我就不是中国人！”

不久，苏树业他们被调到彰德府修漳河桥。

这时节，八路军在晋察冀地区，打得日本鬼子整天缩在乌龟壳（碉堡）里，吓得不敢露面。胜利捷报频频飞来，于是见天晚上，在河套工棚里，工人弟兄们就传讲着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这天后半夜，苏树业听完故事走出工棚，正在河套工地上巡夜，突然打河滩上跳起来两个人。苏树业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只见身前背后站着两个身穿灰军装、手提三八大盖的战士。那两人轻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

苏树业的心激动得砰砰乱跳，两眼放射出亮光。他紧紧抓住两个战士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战士问：“前边碉堡里有多少鬼子？”

苏树业说：“十一个。”

战士说：“老乡，你能不能帮我们叫开门？”

苏树业眼里那仇恨的火光，直打忽闪。他拉上两个八路军战士的手说：“走！跟我来。”

到了碉堡门前，苏树业假装有事，大声叫道：“田中少佐，我们取洋镐！”

---

<sup>①</sup> 日语，吃的意思。



那田中嘴里哼哼唧唧地罵着，刚一开门，只见刺刀一闪，田中扑通倒在地上。几个八路军战士冲进去，一阵急枪密弹，十一个鬼子全被打死。

忽然，远处传来了火车汽笛的长鸣，一列日寇军用火车，转眼冲上了漳河桥头。说时迟那时快，八路军战士早窜出去，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连火车带桥梁都飞上了天空。

苏树业兴奋极了，他决心跟八路军走，当八路军去。可是往前追了半天，再也找不到穿灰军装的战士的身影，他只得转回来。

从此，苏树业学到了这手“活”：明里当劳工应差服役，暗里连拆带毁搞破坏。

在彰德府，几个工人了哨，苏树业偷偷开跑了一辆日本军用摩托，加大了油门，他纵身下车，叫摩托冲进道沟里烧毁。

在双桥，他和一块儿来的许多工人秘密合计好，一齐下手，把六十四米高的“六国电台”的铁塔架给锯折放倒，砸烂了两米多深的地下电缆。

在石景山，苏树业和两个工人，趁漆黑深夜，把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军官打昏过去，扔进了铁蒺藜沟里。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夜，苏树业和工人们被调到石景山钢铁厂，看十一个小化铁炉。日本鬼子不发工资，工人们连“混合面”也吃不上。日本鬼子还借口防止“虎列拉”传染病，每天都把病倒的工人弟兄推进钢厂南的大白灰

池子里去活活烧死……这时，从长辛店鉄路上来了几个工人，跟他們一道干活，还給他們讲反压迫反剝削的革命道理。在这里，苏树业第一次懂得这两个閃光的大字：“革命！”

在这些工人的組織下，苏树业接二連三地参加了石景山鋼鉄厂工人的罢工。苏树业走在罢工的队伍里，举着小紙旗，高喊“我們要工錢”“我們要飯吃”的口号，围着石景山鋼鉄厂示威游行。几天工夫过去，苏树业他們看的十一个小化鉄炉的鉄水都凝鑄在炉子里。

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挨工棚找人上工。他們抓住苏树业，問道：“你的为什么不上工？”

苏树业狠狠地答道：“不发工錢，吃不飽飯，我們就不上工。”

日本鬼子掄起洋鎚把子就打。苏树业渾身帶伤，挺直了腰板，坚定地高喊：

“打死我們，也不上工！”

### “回我扛活的苦海子里鬧翻身去”

苏树业二十七岁上，經過同乡介紹，一个看鍋炉的穷老汉願意把自己的閨女嫁給苏树业。

同乡一提，苏树业說：“咱穷得光大旋，拿啥娶妻？”

同乡說：“閨女家也是熬不下去了。穷人找穷人，有啥困难咱們穷哥儿們頂着。”

这年冬天，穷哥儿們給借来两床被，那被面补得跟銅錢綴起来似的。又借来一个三条腿沒炉盘的炉子，一只豁口

裂紋的鐵鍋，海碗大小的一口小缸，半領破炕蓆，兩個碗，一個泥盆。大家伙又湊錢給新娘子買了一件青市布夾袄。新郎新娘一塊兒吃頓混合面粥，就算娶了親。

結婚第二天，家里揭不開鍋，蘇樹業把新娘子那件青布夾袄拿去当了，換了几斤糧食。

過兩年，樹業得了個閨女，起名“蘇道英”。生道英時，道英媽作了月子病，一個子兒沒有，愣打死里熬出來的，終於落得一身殘疾。

日本鬼子投降，國民黨來了，物價飛漲，抓兵捕人，搶男霸女，無惡不做。蘇樹業離開石景山鋼鐵廠，整天拉排子車，賣黃土。每天后晌，道英媽抱着小道英，提條空面袋，站在街道口上等蘇樹業掙幾個錢，買口高粱面吃。掙不上錢，一家人就挨餓。國民黨統治了三年，蘇樹業家經常是兩天吃不上一頓飯。

一九四八年冬底，解放軍開進了北京郊區，窮苦人見到了紅太陽。

一九四九年春，不少老工人弟兄，都回石景山鋼鐵廠工作去了。道英媽就說：“这回工人当家做主了，咱們快回石鋼去享福吧。”

蘇樹業說：“当家做主，才不應該搶着去享福呢！”

道英媽納悶地問：“那你還要搶着去受苦不成？”

蘇樹業喜上眉梢，笑呵呵地說：“这就說到我心坎上了。咱得挑苦地方去。”

道英媽問：“你還沒吃够苦？”

苏树业說：“做牛做馬的苦，咱是吃够了。先前那天下是人家的，咱扑騰了半輩子，也沒尋出个活路来，如今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咱們得搶先跟着共产党翻身报仇，让咱穷苦人把天下坐个牢实才成呢。”

道英媽問：“那咱們上哪儿去呢？”

苏树业說：“上大生庄。”

道英媽惊詫地問：“去那苦海子里？”

苏树业象敲钟打点似地說：“对！回我扛活的苦海子里鬧革命去！”

穷人好搬家。苏树业撿一副担子，这头挑上苏道英，那头挑上鍋碗席头，道英媽跟在身后，出永定門，过南苑，直奔十几年前扛活的大生庄走来。

### “革命需要我，我决不走！”

翻身的鑼鼓敲得震天响，在地覆天翻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苏树业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了农会主任，不久，又当选党支部书记兼村长。

一九四九年大涝，貧下中农家家戶戶吃不上，政府开仓发救济粮。大家都去領，苏树业却一粒也不要。沒吃的，他就在每天深夜开完会后，踏着星光月色，去坡上开荒种菜，解决家里的困难。

一九五〇年，有一天清早，苏树业去南苑区委开紧急會議。直到太阳偏西散会了，別人都急急忙忙回家，独有苏树业落在后头，慢慢騰騰往回走。走着走着，两腿打晃。原来，

家里揭不开鍋，他已經两天沒吃飯了。

这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苏树业躲在树下避雨，正碰上了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郑瀛洲。郑瀛洲見苏树业穿得破破烂烂，便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錢，假惺惺地說：“苏村长，瞅你也太艰难了。我这儿有錢，你先拿去救救急吧。”

苏树业象挨了皮鞭抽，瞪圓了两眼，怒声喊道：“共产党有的是錢，拿回你那臭票子吧！”吓得郑瀛洲一下子窜进雨地里，麻利跑了。

苏树业立在蒼劲的青松下，望着大雨，二十年間凄苦的生活又扑面而来。他的耳边响起了区委书记那宏亮的声音：“眼下很困难，可这困难是暫时的。咱們共产党員熬点苦，一咬牙就闖过去了。”苏树业一咬牙，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到了家，只見外屋地里，正淅淅瀝瀝“下小雨”。苏树业一掀鍋盖，里面汪了小半鍋雨水。他走进里屋，道英媽摟着孩子，哇地哭出声来，数落他道：“你領着別人种地，給別人領救济粮，可叫我們娘儿几个两天吃不上一口飯……”苏树业哈哈大笑道：“这才好嘛。咱們挨餓，可穷苦的階級弟兄都吃上飯了。要攔解放前，不是大家伙都挨餓嗎？”說着，他出去找了一块上地的豆餅来，把門紧紧插死，点火做“飯”。

正在这时，有人敲門。苏树业忙压严了鍋盖迎出来，一見是区农林局陈科长，便拦住他道：“老陈同志，走，咱上村政府去。”

陈科长早就听說，不管区里村里哪个干部来家里找苏

树业，他都一准給拦出来，不让你进屋去。这回，陈科长說：“行了，我就家里跟你說几句吧。”一猫腰，硬钻进了破草房。

陈科长問救济缺粮戶的事儿，苏树业报了这家报那家，就是沒有自己。

陈科长統計完，起身刚要走，突然肚子咕咕直叫，便說道：“老苏，我还没吃飯呢。有剩的沒有，我吃口。”

苏树业可慌神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好，你先坐会儿，我去挑水烧点湯。”他想出去借粮。

陈科长說：“不用，有口吃的就行了。”随手一揭鍋盖，啊！只見里面是豆餅粥。陈科长一愣說：“老苏，你吃这个哪！”

苏树业一声不言語了。陈科长心里热呼呼的，半天才說：“老苏，你不是說家里还有粮食嗎？”

苏树业說：“嘿，有粮食！想起解放前我那苦日子，如今再断几頓飯，心里也是飽飽的！”

这年冬底，苏树业的老工友們写信来，劝他回石鋼去当师傅，每月薪金二百斤小米。不少人都劝他說：“快走吧，省得整天在这儿急难着窄的……”

苏树业只是呵呵地笑。他把信交給了党支部。在支部大会上，苏树业說：

“眼下是困难，可是，村里需要我，革命需要我，我决不走。”

“咱們就要迎着困難把革命鬧到底！”

一九五一年，蘇樹業堅決響應黨的號召，組織了互助組。這個互助組，一年工夫，就成了志遠莊鄉高產單位。副組長李金才成了棉花豐產模範。

一九五二年冬，蘇樹業到長辛店參加了中共北京市委舉行的黨員訓練班學習，在訓練班里，反復學習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指示。按着黨和毛主席的教導，蘇樹業和二十一家農戶，在一九五三年秋後，辦起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華二社。

創業難！小社剛剛成立，白手起家，要啥沒啥。辦社頭天，牲口拉到了一塊，沒有牲口棚。蘇樹業毫不含糊，一拍大腿叫道：

“來，大小牲口進我屋裏舍槽。”

話沒落地，蘇樹業便動手拾掇屋，把破爛家什都搬在院里；兩間北房，騰出一間。蘇樹業全家擠到西頭，合作社的牲口拴進了東屋。

轉眼間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綠油油的青紗帳甯起來了，突然，濃雲滾滾，一連氣下了幾十天大雨。那棒子棵，眼瞅着越來越黃，越來越瘦了。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柴振國，早就揚言要把小社壓下去，這回，在路上截住蘇樹業，指着小社那棒子地挖苦道：“蘇村長，你是想好好不了，心強命不強呀！這天公不作美，地里澇成了蛤蟆灘，看你還有多大能耐？”

苏树业斩釘截鉄地答道：“地涝了，我們心沒涝！共产党就是不怕困难！”

柴振国齜齜牙，笑里藏刀地說：“苏村长，到你缺吃少穿混不下去了，可想着找我去。”

苏树业沉下脸，“呸”地一声，跨步走开了。

个别社員也沉不住气，心慌意乱地叫喊：“全完了！这回各人变各人的戏法儿去吧。”

党支部号召党员、干部頂住这股风。接着召开社員大会，苏树业代表党支部說：“共产党，就是为鬧革命来的。天塌地陷挡不住咱共产党。眼下碰上天灾，要擱解放前，咱們早家破人亡四外逃荒去了。現在咱們有共产党，有合作社；咱們是集体，集体力量大。这戏法儿不能自个儿变去，得咱們大伙儿在党的领导下，一个心气儿集体变！”

說着，苏树业在前面領头，社員們后边跟着，下地去收拾庄稼。社里又組織了一批社員，进城去拉脚搞副业。到了秋后，每戶社員平均分到近五百斤粮，五百多斤蔓菁和几十元現款。

这下子，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可在庄稼人心里盘住了根。那些存心跟小社較量的单干戶，籽粒未見，都拜了下风。

不久，志远庄、建新庄、西毓順和大生庄等村酝酿合并人社。志远庄反革命分子郑瀛洲、邵景怀、裴春坡等从中施用挑拨离間計，唆使富裕中农四处张揚說：“西毓順砂碱薄洼，大生庄是清一色外来的穷光棍。并成人社，全得吃我們志远庄这块肥肉。”



区委听到情况，立即指出：搞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就是严重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合作社要巩固，要发展，就必须把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搞深搞透。在市委、区委工作组的指导下，党支部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要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挑唆富裕中农向党进行的猖狂进攻，教育社员跟阶级敌人划清阶级界限。苏树业和其他党员干部扎根串连好了几个村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在几个村的社员大会上说：“咱们社员，过去都是穷苦人。咱们是心连心的阶级弟兄。咱们不能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计。他们是成心算计咱们。解放以前，他们谁替咱们穷扛活的打过算盘？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什么时候给咱们出过好点子？……”话不多，却象一把火，点燃起了社员们强烈的阶级情感。三个村的贫下中农坐下来一讨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久，成立了二百多户的志远庄合作社。大家又推选苏树业做了乡长兼社主任。

一九五五年春，西毓顺个别户缺粮，阶级敌人又乘机煽动闹事。地主分子杨宝真和反革命分子柴振国鼓动了十几个人，找苏树业吵吵嚷嚷闹退社。柴振国恶狠狠地说：“苏乡长，走社会主义，不能叫我们挨饿呀。”他还指使两个人揪住苏树业衣领子，叫道：“你给不给钱？不给钱，可要挨活的了。”

苏树业身不摇，心不动。他对柴振国、杨宝真厉声训道：“你们老实点！你们是地主、反革命，人民政府对你们实行专政！”他又把被迷感受欺骗的贫下中农召集到一起，挥

动开两只大手說：“缺粮吃，沒錢花，咱們有手，咱們有力气，泼泼实实一干，就要啥有啥！实在不济了，党和政府还能扶咱一把。咱們不能受他們的騙，跟他們跑。咱們貧下中农是革命的根子。咱們要鬧革命，他們要反革命，咱們得团結一心跟他們干哪！咱們不能碰上点困难就拆自己的鍋台要散伙。鬧革命嘛，咱們就要迎着困难把革命鬧到底！”說完，苏树业亲自上区里領来八十元現款，救济了这些貧下中农。那些地主、反革命分子都被社員們监督劳动改造了。

从这几次反复的階級斗争中，志远庄乡貧下中农，紧紧地团結在党支部周围，团結了中农，孤立了階級敌人，高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紅旗。

秋风送爽时节，志远庄合作社获得了大丰收。社里一下子添置了四个大騾子。社員們分得多，富裕了，人人喜气洋洋。

在困难的日子里，苏树业白日黑夜忙工作，从不把个人的困难放在心里。直到如今，志远庄的社員中还流传这样一句话：“五哥（对苏树业的暱称）三天不吃飯，也是一个劲儿干革命。”

这年春节，苏树业过去的两个徒弟，从石景山鋼鉄厂来了。他們請苏树业去教活，說每月給他一百来元工資，住楼房……。

苏树业語重心长地对两个徒弟說：“孩子們，我十四岁上家破人亡，自个儿要飯走出一千多里地来扛小活儿。三十多年間，我沒吃过飽飯，沒穿过囫圇衣裳。共产党領導我

們翻了身,才有了吃,有了穿。这前头的日月可长着哩。如今党把我安排在这儿,我就要在这儿鬧革命,在这儿建設社会主义。別处,我是坚决不去啦。”

### “扛起紅旗,一直走下去!”

一九五七年,区委开会,号召向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学习,进行科学实验,大搞农业技术革命。苏树业同志开会回来,立即組織力量,坚决贯彻党的指示。

思想鬧不通的人們,吵吵嚷嚷出来说話了。中农生士林說:“搞試驗,鬧丰产,玉米千斤,棉花几百,你眼見了嗎?別拿咱合作社的地瞎折腾啦!”

苏树业說:“党不会給咱出瞎主意,沒錯,干吧!”一边用科学道理解释,一边找李金才等一些貧下中农商議。这时,又出来个别干部对苏树业說:“老苏,这庄稼活上的事儿,找貧下中农可不成,得依靠那些上中农老把式,他們有能耐呀!”

苏树业摇摇头說:“不对!不管干什么事,咱們也得紧紧依靠貧下中农。这是咱們革命的根子呀。俗話說,根深才能叶茂呢。”

苏树业和貧下中农根据玉米密植先进經驗,結合本地土脉和水利情况,决定搞一块玉米高产試驗田。試驗田里,每亩密植两千棵苗。

計劃传出来,老农刘文炳說:“‘玉米轉开身,一棵打二斤’,自古是稀田穗大。留这么密的苗,一准全是枪杆子。”生

士林說：“老苏呀，大秋咱得多套几輛車，好上南苑進北京去賣甜棒秸呀！”

苏樹業不言不語，和黨支部委員、貧下中農、敢想敢干的青年人一起，按區里技術指導員的要求，埋頭苦干。

先是平地整地，苏樹業和老貧農們，使出扛活時练就的全身本事，把地平整得油油亮亮，齊齊整整。接着施足底肥，選擇良種。搖耩撒種，密密實實。到開苗時，為了使密植度準確合理，苏樹業整天蹲在地里，拿尺子一点一点量株距、行距。他們嚴格按技術要求行事，特別抓緊了中耕、施肥、澆水、防治病蟲害等關鍵。隨着棒子長，苏樹業白日黑夜地在地里操持着。

到了陰曆七月十五，黑黝黝的棒子躡過了房簷。一吐花紅綫，一些老農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到了白露，棒子結得硬硬實實，十分飽滿。掰棒子時，苏樹業組織所有社員去掰，又專叫老農去檢斤過秤。結果，這高產田的棒秸，長了一丈多長，每畝地平均一千九百三十七株，結兩千四百二十個穗，其中百分之二十是雙穗。平均每穗長八寸五分，重一斤十二兩。<sup>①</sup> 平均畝產一千一百二十四斤。

科學實驗的成果，生動地教育了干部和社員。劉文炳說：“這合理密植，敢情真不含糊。”生士林拿着大棒子，舍不得放手。他說：“一見真東西，我就服了。今年，別不是咱志遠莊出了財神爺？”

<sup>①</sup> 舊度量衡，一斤為十六兩。

苏树业站在大場上那金光閃閃的棒子堆旁，放声地說：“乡亲们，过去供財神爷，咱們也沒好了。如今，党领导咱們进行科学实验，搞技术革命，才是真財神爷哪！咱們只要听党的話，有了千斤的思想和决心，拿出千斤的干劲，土地不献出千斤粮也不成！”

这一年，志远庄生产队夺得了北京市玉米高产大紅旗。这面大紅旗，一堵山墙般大小，呼啦啦飘在那丰产地里，象一团烈火在燃烧。苏树业站在大紅旗下，說：“这大紅旗是党給咱們的，这功劳是党的！咱們千万不能驕傲。咱們要扛起紅旗，一直走下去！”

一九五八年，志远庄大面积密植玉米，虽遭受較大的自然灾害，还平均亩产八百斤。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苏树业领导志远庄生产队更大規模地进行了科学实验。

一九五九年，搞小麦密植丰产試驗，平均亩产五百二十三斤。

一九六一年，搞水稻丰产試驗，一百七十五亩稻田，平均亩产一千零一斤三两。

一九六二年夏天，收完麦子，又在騰出来的地上搶种麦茬儿玉米，平均亩产四百六十斤。

一九六三年，开始棉花丰产試驗。

截止一九六二年底，志远庄生产队陸續平整了土地五百五十亩。

“試驗田”，“样板田”，成了志远庄生产队的“传家宝”。

**“不要忘記革命，一定把革命鬧到底！”**

由于連續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經济遇到了暂时困难，資本主义自发势力，乘机泛滥起来。

一九六二年，志远庄生产队几戶富裕中农，串通合謀，損公肥私，以沒电井为借口，把生产队长拉下水，暗自从国家种植計划中抽出五十亩地，要隨自己的心意，願意种啥就种啥。好端端的国家种植計划，被改个乱糟糟。

苏树业正在公社学习，听大队总支告訴他这个消息，在取得党委指示以后，便星夜赶回了生产队。党支部連夜召开紧急會議，摸清了全盘底細，部署了战斗。第二天，党支部又召集党员和貧下中农积极分子，端正了認識，統一了思想。苏树业在会上說：“咱們是党员，是貧下中农，咱們都是社会主义的根子。风多大，咱們得带头頂住。咱們心里的社会主义大帳，不能有一点儿含糊。”接着，苏树业和所有干部、积极分子們，分工协作，大抓思想工作，在田間炕头，会上会下，大讲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間的利害关系。志远庄生产队掀起了一場生动的社会主义大辯論。

这天晚上，社員們都集中在队部里，苏树业問道：“今年，咱們粮食够不够吃？”

多数人說“够”，个別人却嚷嚷“不够”。苏树业便找出嚷嚷最凶的那几戶，給他們算細帳。社員們你也算，我也算，一齐算出这几戶每家都有三、四千斤粮。苏树业笑咪咪地又問：“粮食到底够不？”那几戶再也不吭声了，大伙儿都說：

“嘿，今年不够，哪年够？”

苏树业說：“着哇。要是沒有党，沒有社会主义，沒有人民公社，咱們能不能有这么富裕的日子？咱們还都記得解放前那扛长活卖命的苦生活吧。就在这大生庄，我三哥累死了，我累得吐血，差点儿丧命……”

苏树业一訴苦，引得許多老貧下中农忆苦思甜，热泪滿眶。这时，苏树业說：“咱們吃穿不愁了，可是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台湾人民还在受苦，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穷弟兄在受苦，咱們不能忘了他們哪！眼下咱生产队有人找私商拿粮換席，拿大米換枣，拿棒子換小土布……，这还不算，还有人偷偷改动国家計划，朦騙上級，拉国家的肉往自己嘴里填，这是要拉咱們生产队往哪条路上跑？”

社員們憋不住了。貧下中农都站起来說：“咱們队里，有人是財迷心窍啦。偷偷改国家計划，为了肥自己，伤了国家，这是存心挖咱社会主义墙脚呀。我們人民公社社員，我們貧下中农，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决不回头上資本主义的当！”

富裕中农耷拉下脑袋，孤立了。生产队长做了检查。当时大会上，全生产队社員都郑重地举起手，表示坚决执行国家計划，努力搞好生产。

通紅的炉火映着苏树业两鬓飞霜的臉。他想起在公社学习时，一位市委领导同志讲的几句话，便跟社員們說：“同志們，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需要好几輩人才能解决。咱們正建設社会主义，可千万不要忘記階級

斗争，不要忘记革命，一定把革命闹到底啊！”

**“劳动，是咱的根本！”**

一九六一年冬，生产队开辟肥源，挖泡子河泥。几个队干部坐在炉火边研究包工定额问题，怎么也拿不定主意。苏树业说：“带家伙，走！”到了地里，一边干活，一边跟社员们商量，不大会儿，问题解决了。到了动工的那天大清早，正是零下十九度天气，苏树业把棉袄一甩，捋开裤腿子，头一个下了泡子。社员们一瞅老书记下去了，一声喊，都跟了下去。一直挖了两个多月，社员们越干劲儿越足，最后挖出了一千多万斤河泥。社员们齐声说：“天气冷，冰块硬，可我们跟五哥一块儿干活，心里暖和，浑身是劲儿。”“五哥那心贴着咱的心，五哥真是咱一家人。”

一九六二年春，生产队拆旧猪圈盖新猪圈，有个生产小组扒旧圈的砖头，每人每天平均才扒下四百块。统计员叫苏树业去给他们开会。苏树业应了一声，第二天大早，就跟这个小组一道儿扒砖来了。一边干活，一边跟大家聊知心话，他帮助组长改进了工作方法，也鼓起了社员的干劲。这一天，每人平均扒了一千二百块砖。大家说：“啊呀，五哥，你这一来，也不开会，也不批评，咋就出了这么多活儿呢！”

原来，苏树业同志虽然一直当干部，但他坚决听党的话，始终坚持跟社员一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苏树业同志说：“咱们干部，跟社员是一根藤上的瓜。劳动，是咱的根本哪。社员信任咱们，把家业交给干部管，咱们要不出工，不劳



动，忘了根本，还怎么能跟社員一个心眼儿往前奔呢！”因此，社員們不爱干的活，他搶着干。收工钟声一响，別人撂下活茬儿走了，苏树业总要滿队里轉轉，这儿拾掇拾掇，那儿料理料理。他那双手老是閑不住。

一九六三年麦秋，割麦、插秧，棉花、大田上二遍……几种活儿，纏在一起，忙乱之間出活挺少。苏树业就自己打头，組織了队长、副队长、統計、會計、保管等全队所有干部，見天早晨四点钟下地，跟社員一样按包工定額完成任务。結果，一百六十亩棉花上二遍，原本六天的活，只用三个早晨就突击完了。社員們一个个欢天喜地地說：“干部亲自上陣，和社員抱成团儿干，咱这大家大业，没个不兴旺！”

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夜，生产队召开社員大会，号召鼓足干劲，多收新鮮蔬菜，供应首都节日需要。散会都快十一点了，苏树业对干部們說：“咱們光动嘴不行，走，拿镰刀干一会儿去！”

这話叫“三八組”一个女社員听去了，她回去一嚷嚷，“三八組”女社員都拿上韭镰下了韭菜地。月光清朗，滿地笑声，干部社員一块干起来。过了午夜，苏树业劝大家回去歇息，一个女社員說：“五哥，你們要不来呀，我們早走了。你們来了，我們得多割几畦再走。”一个老大娘說：“五哥，你們歇着去吧，瞅你們白天不少干活，夜里加班开会，操心費力的，我們社員真心疼你們呀。”

苏树业直和社員們一块割到深夜，才一齐回去休息。五六点钟，又都回来接着干。两天的收割任务，七个钟头就

完成了。

苏树业同志不忘根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志远庄生产队社員們政治上的領路人，生产上的带头人。志远庄生产队的社員們說：

“五哥一說話，咱們干劲大！”

“哪儿有困难，哪儿有五哥；五哥到哪儿，哪儿困难沒！”

**“咱們父輩人，得教出革命的后生来！”**

一九六二年夏天，苏树业的大閨女苏道英眼看要初中毕业了。赶个大早，苏树业騎車上南苑，买了嶄新瓦亮的一把鉄鍬，一把小鎬子，一把三齿和一把薅刀子。回家花了多半天工夫，整治得十分順手。就在这时候道英回家了。一进院，苏树业就亲切地叫道：“道英，你看爹爹新置的这几件家伙好使不？”

道英挨个儿使过，称赞道：“好使。”却不言語，朝爹爹抿嘴一笑，进屋去了。

原来，这苏树业家，个个孩子都从小下地干活，都有自己的份农具。唯独道英自幼在外讀書，沒有她专用的家伙。这次道英回家，正是要征求一下爹娘对自己决定还乡务农的意見，爹爹虽未說話，却新添置了一整套农具，姑娘早明白了爹爹的心意，越发坚定了自己崇高的理想。

轉眼間，放暑假了，道英便立即还乡参加农业生产来了。当天晚上，道英向爹爹問道：“爹，我什么时候下地干活？”

苏树业并不直說，有意試探地說道：“眼下活茬儿正吃紧用人，你瞅着办吧。”

道英脆脆响响地答道：“那我明儿就下地。”

苏树业乐呵呵地說：“着！正对了爹的心意。”

第二天，鸡叫二遍，苏树业就把道英叫醒。苏树业說：“今儿是你下庄稼地的头一天，我有几句话得說說。你是共青团員，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事事打先锋。出工干活，你得‘叫早’，跑在头里；收工打歇，你得煞后。干活不许省功图快，不能怕累嫌脏。你记住了嗎？”

道英答道：“记住了。”

苏树业又說：“我还有三个要求：第一，要坚决服从組織分配，老老实实听队长、組长的分派調遣，哪儿困难，奔哪儿走；第二，要扎扎实实向叔叔大爷們学活儿，跟社員搞好团結，不准翘你們那知識分子的尾巴；第三，要坚决和四类分子、坏人坏事做斗争。你都记住了嗎？”

道英深深地点头答道：“记住了。”

苏树业这才把那四件新添置的家伙递到道英手里，語重心长地說：“爹爹传给你的东西，就是这四件家伙，四件宝。爹爹盼望你的，就是一辈子不放下它！”

道英紧攥住家伙把子，鉄鉄实实在地答道：“爹，您放心吧！”轉身扛鎬找队长分配活儿去了。

在苏树业的严格教导下，道英很有革命志气，她干得好。年底就被評为五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冬，志远庄生产队挖了七天河泥。开战头

天晚上，苏树业特别给青年人开了会。十点钟散了会，大圆月亮挂在双泡子上空，苏道英跟十个姑娘，悄悄地握锹扛镐，顶着牛吼般大风，当夜就抢挖河泥去了。很晚了，等道英妈一觉醒来，才见道英拖泥带水地回来。一大早，苏树业又叫上闺女一道儿下泡子去了。

一连三天，道英妈再也憋不住了，抱怨树业道：“你就不知道体贴孩子的辛勤甘苦。地里干活，你老挑她的眼。叫她当民兵，叫她上突击队，劳累一天，叫她跑多远去给社员换粮换面，……别的姑娘干不了的，你都支派她干去。这十冬腊月下水挖河泥，壮小伙子也怵三分，你领着道英这么干，要把身子骨毁了，十七八的姑娘可怎么办呢？”

苏树业笑笑说：“饭吃饱了，觉睡够了，小青年子就得往苦里钻，往硬里干。”

道英妈说：“你就不能松一松尺码，准得那么严？”

苏树业先是嘿嘿笑，接着郑重地说：“你这思想就要不得。对小青年子就得严。严了，往后他们干革命，搞建设，过生活，才能靠谱儿。一松尺码，他们就许忘本，就许褪色变质。咱们父辈人，得教出革命的后生来呀！道英她们锻炼这么几天，吃点子苦，比我十五岁在地主生聿丰家扛小活吃的那苦，不知要强到那儿去了。”

道英妈想不通。她指着屋里那自行车、无线电、马蹄表、暖壶，快挨上房柁的粮食口袋和那炕上每人一床被褥，大人孩子的灯芯绒、线嘤嘤衣服，说道：“如今的生活能跟从前比？还不叫孩子们享享福？”

苏树业也指着这些东西說：“打咱們往上数，哪輩子人做梦梦到过这些个东西？共产党来了，道英她們簡直是在糖罐子里喝蜜水啦。可是，天下穷人还有的是，要是老慣着她們享清福，不叫她們吃些辛苦，再过不了多少年，她們一准得忘了咱們那苦根儿，忘了天下的穷苦人哪！你那心思，得往长里核計；你那眼睛，得往远里看。咱这革命大家业，千秋万代的，全指靠一輩一輩革命的后生往下传。要依你的主意办，养成一窩子敗家子儿，那还不早晚坏了大事呀！”

道英媽說不出理儿来了，道英却越干劲越足。

一九六三年春节，大年三十晚上，苏树业全家坐上炕头包饺子。几个小孩子吵鬧說：“人家都吃瓜籽儿、杂拌儿，咱們也买……”

弟弟妹妹鬧，道英也說：“爹，就买点吧。”

苏树业說：“好，我先給你們讲个故事。讲完了，你們还說买，咱們就买。”

“三十五年前，在老家山东省东阿县。有一个苦孩子，他过十三岁的生日时，全家已經四天沒吃飯了……”

苏树业从头讲起了自己的家史。讲到正月十五深夜，他从家里要飯出来时，大人孩子都哭了。小闺女倒在苏树业怀里，扑瞪着大眼睛問道：“后来呢，后来这个小孩还活着嗎？”

苏树业說：“后来，这个苦孩子扛长活、当劳工，受尽了地主、富农、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压迫剝削。共产党毛主席来了，他才翻了身。如今，他快五十岁了。有一回过年，他



庄寿紅 图

們家換了几十斤白面，八斤肉，十几斤粉。到腊月三十全家坐在炕头上包饺子时，他的几个儿子女儿都还非叫他去买瓜籽儿和杂拌儿不可……”

讲到这里，苏道英猛地跑出屋，躲在外边哭起来。半天，她回来拉着弟弟妹妹們的手說：“还买瓜籽儿、杂拌儿嗎？”

弟弟妹妹們都眼泪汪汪的，再也不鬧了。

从此，苏道英更加努力，不仅学会了許多活茬儿，而且連續被評为五好社員，五好青年，五好团員。

……好了，做为一篇家史，我們不能介紹更多的材料了。还是讓我們回到那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去吧。

## 尾 声

大年初一夜，人民大会堂里，张灯結彩，春节联欢会开始了。

掌声和欢呼声，象山洪暴发一样响起来。刘主席、董副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書記、彭真市长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見全体代表。当刘主席、董副主席、周总理同苏树业亲切握手时，苏树业同志脸上挂滿泪水。这泪水呀，自他离开山东老家后，三十多年間，在地主、富农、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下，他沒有流过；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他沒有流过；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也沒有流过……。但是現在，他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他的心头，有千言万語要傾訴，但是他的嘴唇微微一动，什么也說不出来。

丰富多彩的节目在演出。苏树业看了一会儿，又慢慢走回休息厅里。他坐在沙发上，掏出旱烟袋，大口大口地吧嗒起来。

苏树业，一个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一个饱尝旧社会艰辛苦难的奴隶，在共产党毛主席来了以后，阶级地位起了根本变化，翻身成了世界的主人。现在，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他正和志远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全体社员们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苦海子里的志远庄生产队，正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化。苏树业同志的心里，象五湖四海在翻腾。他慢慢走到毛主席那高大的塑象跟前，低声但坚决有力地說：

“敬爱的毛主席呀，您老人家救了我們。您老人家教导我們鬧革命，給了我們今天的幸福。我在您面前宣誓：我們貧下中农要一个心眼地跟紧您，順着您指出的大道，攥紧大鋤，不歇气，不停脚，泼泼辣辣地干一辈子，直把革命鬧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啊，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邢富源 整理）



